

2018年9月号

对拉兹·切迪的采访
第36页

沸点
第22页

是否存在侨汇陷阱？
第44页

FD & 金融与发展

东南亚 处于上升期的地区

目录



对于东南亚而言，未来的几十年将令人振奋，但同时也将充满动荡。

处于上升期的东南亚地区

- 4 保持势头
从人口结构变化到气候变化，东南亚面临着许多挑战
麦努·巴斯卡兰
- 10 直言不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对于东南亚来说，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大胆的改革
李昌镛
- 12 亚洲职业女性
亚洲劳动力大军中女性的地位不断提高，越南尤为突出
安嘎纳·巴纳吉、阿尔贝·戈琼巴腊吉、萨恩迪乐·赫拉茨赫瓦尤、安·凡乐
- 18 隐藏的祸患
贩卖人口这样的犯罪鲜有报道
梅里·萨巴勒罗·安东尼
- 22 沸点
东南亚正在遭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激烈的增长
阿米特·普拉卡什
- 27 传递接力棒
东南亚的年轻人拥有比其父母更加光明的未来，他们已经准备好走向世界
耶利米·奥弗曼、维娜·萨拉查、根邦·努桑塔拉
- 31 亚洲的数字化革命
新的一波数字化创新浪潮正在重塑亚洲，并提升该地区的增长潜力
塔辛·萨迪·赛迪克



52

本期还有

- 44 **是否存在侨汇陷阱?**
高侨汇水平可能会引发经济停滞及依赖的恶性循环
拉尔夫·沙米、埃克哈德·恩斯特、康奈尔·弗伦坎普、安妮·欧金
- 48 **非洲携手共进**
撒哈拉以南非洲日趋融合——这将有助于增长,但并非没有风险
弗朗西斯科·阿瑞萨拉、马修·贝隆、马尔戈·麦克唐纳
- 52 **知识如何传播**
知识更迅速地扩散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好处
约翰内斯·尤格斯特、胡琪昂、弗洛朗斯·若默特、罗伯特·皮亚扎
- 54 **留意性别差距**
男性经济学家和女性经济学家的不同观点可能会影响政策结果
安·玛丽·梅、
大卫·库切拉、
玛丽·麦克加维



60

其他内容

- 34 **图表释义**
处于尖端位置
东盟国家有望成为第一数字经济体,但仍面临一些核心挑战
冯佳
- 36 **经济学人物**
数据倡导者
克里斯·威利兹采访拉兹·切迪,目前切迪正在利用大数据重塑有关社会流动性的研究
- 42 **前沿**
贫穷与腐败的关联
劳拉·阿朗索谈反腐斗争为什么必须在多条战线上展开
- 56 **回归基础**
政府补贴:喜忧参半
一些政府补贴是合理的,但往往也存在缺陷
本尼迪克特·克莱门茨、伊恩·派瑞
- 59 **书评**
《全球主义者:帝国的终结和新自由主义的诞生》,
奎因·斯洛博迪安
- 60 **货币**
纪念币
展示年度全球盛会的纪念币
萨沙·尤梅纳



36



处于上升期的 东南亚地区

斯雷尼特·哈克，25岁，八年前搬到柬埔寨首都金边，攻读媒体管理学士学位。

相比起她的故乡小镇（她的父母和亲戚目前仍然居住在那里），金边为她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我能见到更广阔的世界；能够做我想做的事情。”她这样说道。

数百万像哈克一样的年轻人正在塑造东南亚的未来。东南亚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拥有6.43亿人口。从城市国家新加坡到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十个国家联合组成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多样化的社区。

东南亚经历了灾难性的金融危机、武装冲突以及无数次的自然灾害。然而，该地区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建立起竞争性经济，并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还使数百万民众脱离了贫困。

IMF将在印度尼西亚举办年会，借此机会，我们对该地区进行了一次深入了解。我们着眼于东盟国家面临的多重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快速老龄化、贩卖人口及地缘政治变化所带来的切实的威胁。此外，我们还讨论了由数字技术、女性融入劳动力市场以及该地区内更加紧密的合作所带来的令人振奋的机遇。

“有正确的政策指导，东南亚能够依靠其民众的创造力、适应力和活力来应对所有这些挑战。”IMF亚洲及太平洋部主任李常荣如是说。

对于像哈克一样的年轻人而言，未来一片光明。但是她深知只有坚持不懈地奋斗才能最终获得成功。她说：“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和安排。我想证明给大家看我能做到，甚至能做得比其他人更好。” **FD**

卡米拉·伦德·安德森（CAMILLA LUND ANDERSEN），主编



本期封面

IMF和世界银行将在印度尼西亚举办今年的年会，为此我们特意推出本期内容，重点关注东南亚国家。插画家迈克尔·瓦拉克萨（Michael Waraksa）在本期的封面上向我们展现了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一个美妙奇幻的东南亚。

主编：
Camilla Lund Andersen

执行编辑：
Maureen Burke

高级编辑：
Chris Wellisz

助理编辑：
Marie Boursiquot
Bruce Edwards

数字编辑：
Rahim Kanani

在线编辑：
Lijun Li

生产经理：
Niccole Braynen-Kimani

文字编辑：
Lucy Morales

编辑顾问：
Bernardin Akitoby
Celine Allard
Bas Bakker
Steven Barnett
Nicoletta Batini
Helge Berger
Paul Cashin
Luis Cubeddu
Alfredo Cuevas
Rupa Duttagupta

Thomas Helbling
Laura Kodres
Tommaso Mancini Griffoli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Inci Ötker
Catriona Purfield
Uma Ramakrishnan
Abdelhak Senhadji
Alison Stuart

©201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版权所有。
如需翻印本刊文章，可通过填写在线表格（www.imf.org/external/terms.htm）或发送电子邮件至copyright@imf.org进行申请。如用于商业用途，可通过版权税计算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www.copyright.com）获得授权，并支付一定的象征性费用。

本刊的文章和其他资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订阅服务、地址变更和其他广告事宜，请联系：
IMF Publication Services
Finance & Development
PO Box 92780
Washington, DC, 20090, USA
Telephone: (202) 623-7430
Fax: (202) 623-7201
E-mail: publications@imf.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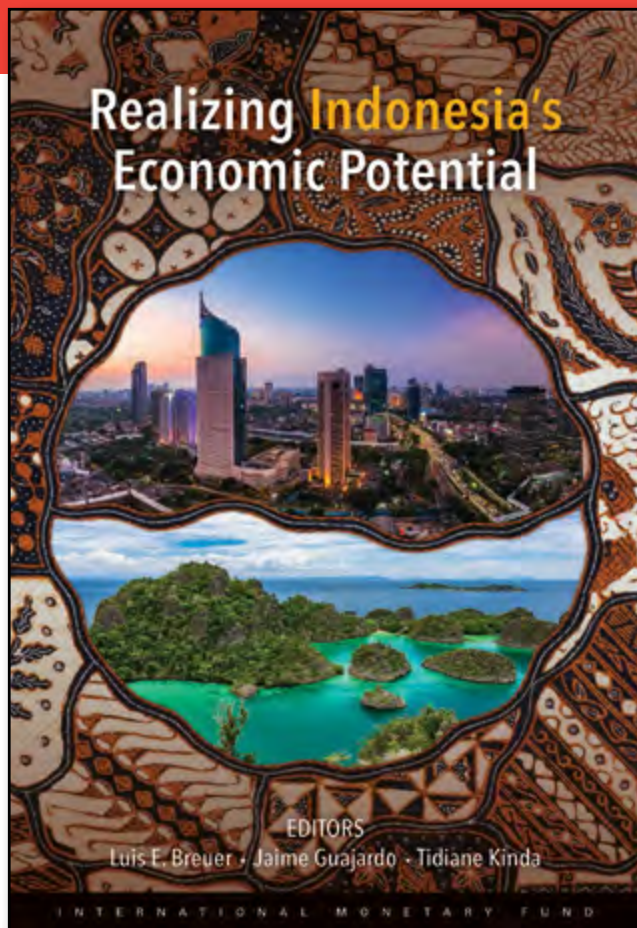
《金融与发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季刊（地址：700 19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出版。

中文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翻译出版。
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电话：010-88190916
传真：010-88190916
邮政编码：100142
网址：<http://cfeph.cfemg.cn>
英文版刊号：ISSN 0145-1707
中文版刊号：ISSN 0256-25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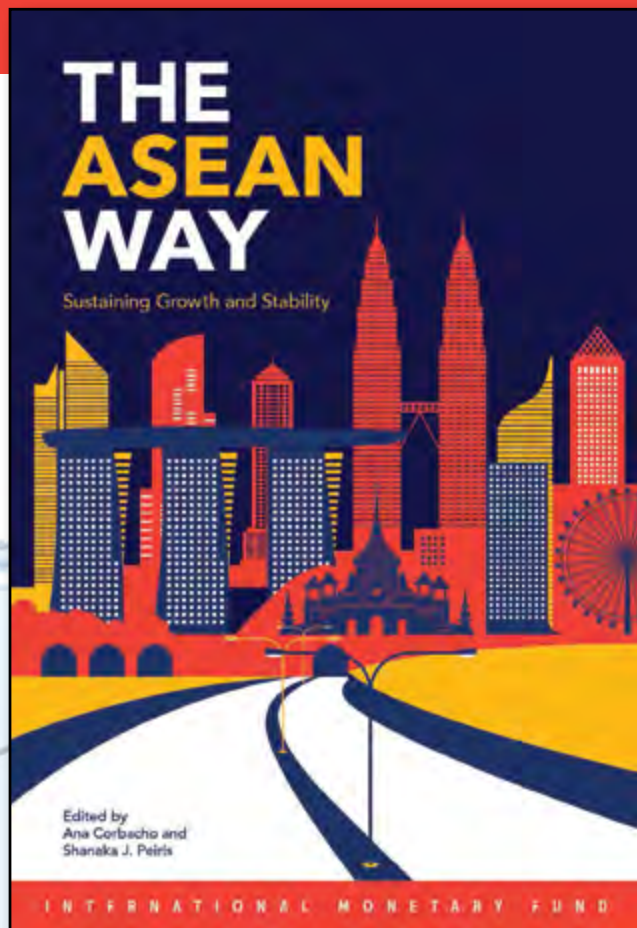


IMF推荐图书

IMF与东南亚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地区的第一大经济体。本书对影响该国未来经济前景的因素进行了全面的综合分析。



随着全球风险持续考验东盟五国的恢复力，本书阐述了加强政策框架如何有助于应对未来的挑战。

有关以上两本图书及其他更多图书的相关信息，请浏览

[Bookstore.imf.org/fd918a](https://bookstore.imf.org/fd918a)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vibrant tropical scene. The top half features a clear blue sky with several white birds in flight, framed by lush green foliage including large monstera leaves and palm fronds. In the lower half, a stone Buddha statue is visible on the left, surrounded by more tropical plants and colorful, abstract shapes like a yellow teardrop and a blue teardrop. A colorful fish is also visible on the right side.

保持势头

从人口结构变化到气候变化，东南亚面临着许多挑战。
克服这些挑战既需要毅力，也需要灵活性

麦努·巴斯卡兰



东南亚制造惊喜的能力从未让人失望。最近，马来西亚的选民们证明了权威专家的错误判断，选举出一个改良派的政府。新政府正充满热忱地迎接国家所面临的挑战。1998年以来，印度尼西亚也给予了我们同样的惊喜，完成了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民主转型。诸如廉价航空亚洲航空公司等企业一跃成为了行业巨头，而且当地的独角兽公司众多，打车平台 Grab 公司便是其中的一个。

诸如此类的例子让我有理由在越发动荡不安的全球环境下对东南亚的前景保持乐观。的确，这个地区拥有 10 个国家，人口达到 6.43 亿人，其中既有老挝这样的位于崇山峻岭中的农业国家，也有新加坡这样的拥有全世界最高生活水平的闪亮的城市国家，因此很难对它进行概括。但是，我相信这个地区将会成功战胜从人口老龄化到气候变化，从科技进步到变幻莫测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潮流等众多的全球挑战。东南亚过去曾经遭受过严重的冲击，但都成功应对，尤其是 1997 年至 1998 年的金融危机，而该地区也变得更加强大。东南亚未来的成功将取决于其灵活适应全球趋势的能力，以及从无法避免的冲击和压力中恢复的能力。

老龄化趋势

东南亚将如何适应变化？让我们从人口结构谈起，因为许多问题都是由此产生的。该地区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人口转型，不仅人口增长放缓，老龄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新加坡和泰国的老龄化速度加快，甚至那些人口相对年轻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将面临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放缓的问题。大量廉价劳动力带动以出口为导向

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帮助实现工业化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几乎整个地区都不例外。

与此同时，联合国预计，到 2030 年城市人口将从当前人口总数的 49% 扩大到约 56%。这意味着多出的 8000 万人口将涌入城镇，为争夺工作和设施互相竞争。但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也意味着这 8000 万人有机会进入充满活力的城市当中，贡献更多的生产力并获取更高的报酬。对于出售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提供各式服务的企业来说，这些工作者将形成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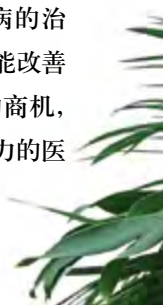
科技进步是否能帮助东南亚应对这些人口结构变化的问题？包括机器人技术在内的人工智能的进步，以及 3D 打印和新型复合材料的创新将会改变制造工艺，改变原本劳动密集的模式，同时也为新产品创造机遇。这将开启产品制造的新途径，也将改变竞争的驱动力。此外，这还会产生一些间接作用，比如，利用碳纤维等新兴复合材料，飞机制造商开发了一种超长途飞机，随着比较便宜的点对点旅游选择的出现，这种飞机可以为东南亚带来更多的游客。

还有其他一些例子：

- 随着社交化、移动化、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理念的广泛运用，企业有了更多提高收益和接触客户的途径，而客户也将获得更加贴近其需求的商品和服务。

- 可再生能源将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尤其是太阳能和风能。这会减少该地区对污染性的化石燃料的依赖，并增强能源安全。

- 大量的新型生物医学疗法，其中一些是基于基因组学的，将会改变对一系列疾病的治疗，这可能不仅会提高人的平均寿命，也能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这些创新也会带来新的商机，在曼谷等地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医



疗中心。

东南亚在吸收这些新技术的同时，也必须应对新形式的全球化和区域融合。但是，当前对全球化的预期可能过于悲观。自由贸易和移民确实受到了发达国家的反冲，但这并不是游戏的结束。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东南亚，这种反冲都有可能起到改进社会契约的作用，催生出更加平衡的政策，从而通过更加安全的保障和再培训计划为全球化的失败者提供进一步补偿。

融合的形式

最终，东南亚将会享受到全球化和其他模式的经济融合带来的协同效应，但是这种融合的形式和与形态是变化的。在某个层面上，“全球整体的”多边行动可能更难实现，但是次区域经济伙伴关系或跨境贸易等小型融合是可以扩大的。由10个成员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已经为融合制订了具体方案，如202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这一独特的东南亚融合方式为促进商品、服务、资金、数据和人员的流通设立了长远目标，并且每个国家的目标都具有相当大的弹性。

该地区已经享受到了很多其他形式的融合所带来的福利。例如，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北部的

东盟国家已经为加强融合共同努力了20多年，大大改善了交通情况，也加速了贸易和劳动力的流动。泰国及其邻国的跨境贸易把一座座小城镇变成了繁华的枢纽城市。东南亚在融合方面做出的努力可以作为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榜样。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处在这样的融合趋势下的国家具有更强的改革和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动力——正如在过去20年全球化中所发生的那样。

东南亚也很有可能保持与全球经济的高度融合。持续暴露在全球金融流动中会产生如下两类挑战。

第一，金融市场会更频繁地遭受压力、偶然的冲击和全面的危机。问题的根本在于国际金融结构，一些危机后的改革帮助加强了全球金融体系，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会继续受到大量不稳定的资本流动的冲击。在许多情况下，这可能仅仅意味着区域内的货币流通出现不可预测的波动，使得货币政策的制定复杂化，从而产生商业上的不确定性。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资金流动更加不稳定，造成货币、股权和债券市场的恐慌，从而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造成有害的后果。

第二，随着其巨大的资金储蓄自由化并流出本国，中国将在全球金融中起到更加实质性的作用。中国也实施了一些举措，如“一带一路”倡议，



东南亚需要毅力来应对这一阶段令人不安的变动。

以及成立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这些都将成为全球金融结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气候变化

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挑战同样重要。尽管海平面上升和逐渐增多的暴风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很难预测，但亚洲开发银行认为东南亚将是全球受打击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见本期杂志第22页的相关文章）。每年笼罩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部分区域的森林火灾产生的浓烟告诉我们，损失是广泛而惨痛的。

水资源短缺问题虽然没有那么突出，但它是另一个冲突和经济问题的潜在来源。水资源造成的压力已经开始出现，其中部分原因是，中国在湄公河上游河段修建了一系列水坝，这改变了营养丰富的沉积物的流动和每年的洪水脉冲（不同季节的河水水流的波动），影响了湄公河下游人们赖以生存的渔业和其他活动。管理东南亚的水资源，确保公平、足量地安全供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新技术

让我们看看这些全球趋势对该地区意味着什么，先从技术进步的影响谈起。关于大量工人将被取代的预言似乎过于悲观了。在市场经济中，随着新产业的诞生和其他产业的衰退，一些工作被取代是很正常的：这一过程有时会加速，有时也会减速。在未来几十年中，这种取代的步伐可能会加快，但是就业机会也会增加。我们中有多少

人能料到互联网会催生网络安全行业，为全球数十万人提供了就业？根据美国计算机行业协会估计，单是美国就有约76.8万人从事网络安全工作。类似地，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的出现也会创造新的职业。

东南亚如何应对技术变革和动摇现有竞争力结构的其他发展？通过制造业回流来发展经济很可能会获得更多的青睐。此外，一些技术会形成网络效应，使大经济体比小经济体更具优势。阿里巴巴、Alphabet、脸书和腾讯等公司出现在中国和美国并不是巧合。

中国很可能会继续在价值链上攀升，而印度随着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的改善，其制造业的地位将会提高，制造商也能更好地发展规模经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后发国家会拒绝由出口带动的制造模式，原因有两点：

第一，现有产业涉及一连串的活动，科技不太可能将每一个行业都转变为完全不需要劳动密集型工作。例如，纺织、服装和制鞋等行业对自动化的使用程度是有限的。

第二，新技术可以为东南亚的发展中经济体带来活力。通信和计算机方面的进步已经帮助菲律宾从零开始，发展出一个全新的行业——业务流程外包。新兴技术的多样性会提供更多这样的机遇。

增强适应力

东南亚需要毅力来应对这一阶段令人不安的变动，或者说需要拥有从冲击和压力中恢复的能力。同时，该地区还必须保持灵活性，在利用机遇的同时降低由技术颠覆和气候变化等长期挑战

带来的风险。

自从1997年的危机过后，该地区的适应力已经有了提升。经济更加多元化；政府采取了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由于银行等机构有了更加雄厚的资本，金融结构发生危机的倾向降低；企业、家庭、金融机构和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纷纷好转。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要研究一下近年来该地区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成功经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持续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和大宗商品价格崩溃等带来的冲击和剧烈的市场波动。

要预测该地区将如何灵活地应对可能遇到的转变和错位，要看企业和个人做出的自发的、自下而上的调整，以及政策驱动的调整。

自下而上自发的调整大多状况良好。该地区的企业在转型方面有着骄人的记录。其中，亚洲航空公司，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已经成长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航空公司，其分支机构遍布整个地区。近年来，泰国企业——如正大集团和暹罗水泥集团——纷纷扩张自己的规模，这种景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他们的版图已经覆盖整个湄公河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

政府支持

在政策驱动调整的领域里，该地区出现了许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商业活动，这将成为创新的跳板。其中，许多得益于政府以行业总体规划、激励工业园区建设以及吸引外资等形式提供的支持。泰国的东海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发展成为石油化工产品和汽车的主要制造中心。泰国政府目前计划把这个区域进行改造扩张，成为东部经济走廊。马来西亚的檳城—居林走廊和依

斯干达南部地区都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和物流产业集群。

改善政策驱动调整的关键是提供公共物品，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技能培训、研发，以及社会保障网络。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经过数十年的缓慢进展之后，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终于扭亏为盈，实现了重大盈利。

政府同时也在简化规程并解决腐败问题。印度尼西亚在世界银行营商便利度指数方面的排名已经提升，其反腐机构大胆地起诉了数百名官员，其中包括一名国会发言人、地区领导人和高层官员。过去有罪不罚的文化使腐败难以根除，现在这一风气已经大大消除。马来西亚新政府在反腐方面同样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可作为其他国家的典范。

对于东南亚来说，今后的数十年应该是令人兴奋的，因为技术进步和全球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是动荡的，因为风险仍然存在，国际金融结构并没有发生变革，依然不稳定。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决策者们还没有处理好每件事情，但是他们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企业在规模和成熟度方面都在进步，帮助该地区的经济灵活有效地适应新的挑战。东南亚过去面对挑战曾取得不错的成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它将续写辉煌。FD

麦努·巴斯卡兰 (MANU BHASKARAN) 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战略咨询公司百年纪念集团 (Centennial Group) 旗下的新加坡亚洲百年咨询公司 (Centennial Asia Advisors) 的首席执行官，其从事关于东南亚经济和政治趋势的研究逾30年，曾任职新加坡政府行政服务部门，以及担任SG证券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李昌镛 (CHANG YONG RHEE)
是IMF亚太部主任。

照片:IMF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对于东南亚来说，进一步的发展需要 大胆的改革

李昌镛

近几十年来，东南亚已经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位于全球首位。去年，该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位列第四，紧随中国、印度和美国之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率急剧下降。

这样的成就归功于什么呢？开放对外贸易和投资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马来西亚和泰国将自身打造成为全球制造业强国，大量生产汽车、家用电子产品和计算机芯片。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跻身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型内需拉动型的新兴

市场。新加坡是一个大型金融和商业中心。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等前沿经济体在加入东盟后开始放弃过去几十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而与区域供应链进行整合，尤其是中国的供应链。

良好的经济管理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确实是一次倒退，但是东南亚迅速回弹且变得更加强大。银行纷纷重组，金融监管得到加强。本地货币债券市场扩张，减少了对不稳定的资本流动的依赖。一些国家进一步采取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和所谓宏观审慎政策，用于监管和预防金融系统风险，物价上涨和信贷增长因此得到了控制。

最终，该地区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仍需进一步发展经济，以迎接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率上升、贸易关系紧张加剧、中国增长放缓等短期挑战。对于越来越相互依赖且积累了更多债务的经济体来说，这些都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

基本要素

然而，从长期看来，更多的基本要素会对东盟领导人和民众提出考验。东南亚已经大大缩小

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降低了对非技术性工种的需求。

了和世界最富有国家之间的差距，但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未知的。该地区还不能高枕无忧。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必须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大胆改革。

在即将面临的挑战中，人口结构的转变显得十分突出。在最近几十年间，劳动者数量的增长比非劳动者更快，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这一人口红利现在开始衰退了。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处于就业年龄的人口仍然在增长，但是泰国和越南等其他国家的劳动人口预计将会迅速缩减。简单地说，东南亚面临着未富先老的风险。

相应地，东南亚必须加强其养老金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关照越来越庞大的老年群体。让更多的人成为劳动力，尤其是妇女，可以帮助保持发展引擎继续轰鸣。除了越南等个别国家例外，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在整个东南亚持续走低。提供托儿所服务和灵活的工作安排可以鼓励更多的妇女走入职场。

所需的技能

另一个障碍是生产率增长减缓。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比较发达的东盟经济体开始丧失他们的一些竞争优势。与此同时，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降低了对非技术性工种的需求。因此，制造业将逐渐增加对数量少但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的需求。一旦超过了中等收入水平，该地区就不能再依靠现有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增长模式。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面的进步在制造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额外的挑战。劳动者们需要接受教育和培训，为数字化时代的职业做准备。政府也应该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并升级改造公路、港口和宽带等基础设施，以改善营商环境。

当然，这些都需要钱。东南亚的税收占 GDP

的 13%，低于 15% 的国际平均水平。该地区要进行必要的投资，就必须改变这一现状，促进生产力增长，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准备。但光是筹集更多的资金还不够：纳税人的钱是宝贵的，必须要有强大的政策和体制来确保这些钱花得明智。

随着贸易模式和技术重塑了竞争格局，东南亚必须更多地依靠内需，而不是本地区之外的商品销售。因此，进一步的融合很有必要。东盟已经大幅降低了工业制成品交易的关税壁垒，这将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并更加充分地开放服务贸易和劳动力流动的市场。

到 2025 年完成东盟服务贸易协定的目标将是东南亚迈出的一大步。如果要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该地区不能无限期地依靠街边小店和饭馆的低工资、低技能的服务性岗位，而是必须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和程序员，以及照顾老年人的家庭健康护理方面的专业人员。为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该地区需加大对本国人民的投资，并且向海外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开放市场。

当然，我们必须牢记快速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为保持可持续性并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经济政策必须确保包容性增长。政府应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鼓励竞争，并挑战既得利益群体。

东盟成立逾半世纪以来，该地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重大的挑战依然存在。幸运的是，有了正确的政策，东南亚可以依靠其民众的创造力、适应力和活力来迎接这些挑战。IMF 一直是该地区发展的重要伙伴，并且在未来也随时准备着继续为东盟成员国提供服务。FD

李昌镛 (CHANG YONG RHEE) 是 IMF 亚太部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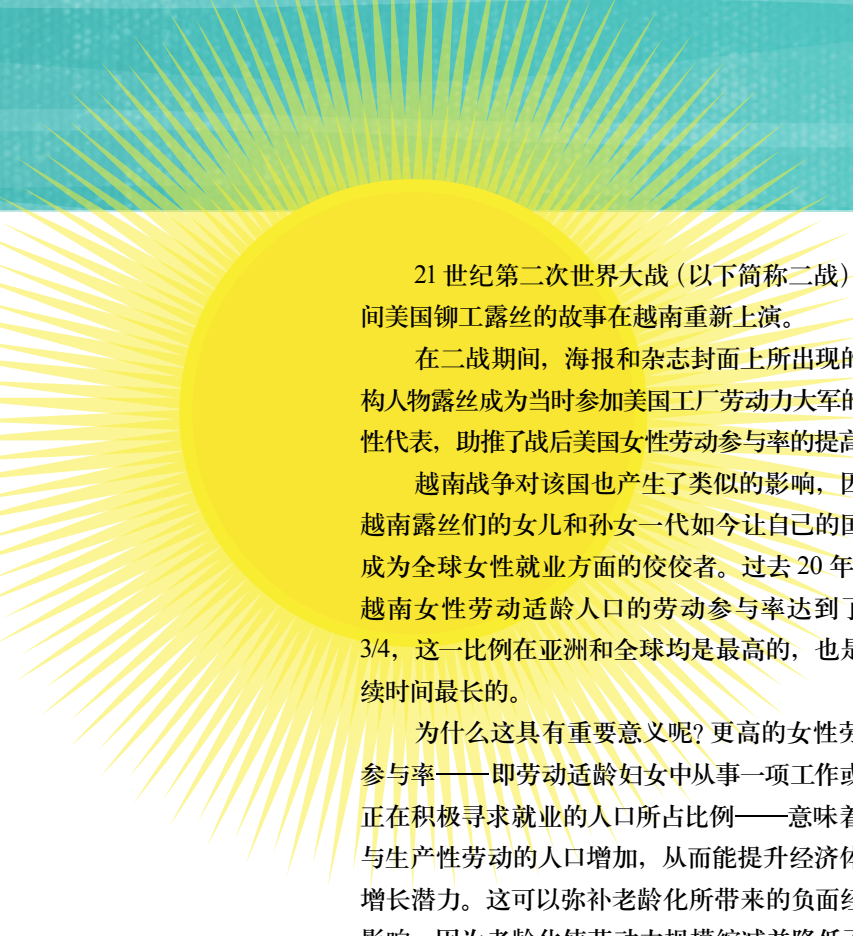


亚洲 职业女性

亚洲劳动力大军中女性的地位不断提高，越南尤为突出

安嘎纳·巴纳吉、阿尔贝·戈琼巴腊吉、萨恩迪乐·赫拉茨赫瓦尤、安·凡乐





21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期间美国铆工露丝的故事在越南重新上演。

在二战期间，海报和杂志封面上所出现的虚构人物露丝成为当时参加美国工厂劳动力大军的女性代表，助推了战后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越南战争对该国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因此越南露丝们的女儿和孙女一代如今让自己的国家成为全球女性就业方面的佼佼者。过去 20 年来，越南女性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达到了约 3/4，这一比例在亚洲和全球均是最高，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

为什么这具有重要意义呢？更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即劳动适龄妇女中从事一项工作或者正在积极寻求就业的人口所占比例——意味着参与生产性劳动的人口增加，从而能提升经济体的增长潜力。这可以弥补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因为老龄化使劳动力规模缩减并降低了增长率。

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地区，其人口数量占全球总人口的 60%，但目前亚洲正在快速老龄化。因此，让更多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对于加强亚洲的经济活力并确保未来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也使得女性能够实现经济自主和其他各种愿景。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18 年一份题为“平等的力量：亚太地区性别平等之路”的报告预测，到 2025 年，该地区性别平等将使年度 GDP 整体提升 12%，即增加 4.5 万亿美元。

一些研究人员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即劳动力人口中女性比例的提高以及女性提升至重要岗位有助于促进收入平等，实现经济多元化并推动企业利润率和效率的提升。

呈现上升趋势

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亚洲呈上升趋势，许多其他国家正在追赶越南的水平。平均而言，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亚洲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了约 6 个百分点（见图 1），与发达西方经济体的差距不是很大（IMF，2018）。我们即将公开的论文探讨了亚洲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发展变化。

整体情况在不断改善，这体现了亚洲女性劳

动参与率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区域和全球范围内表现更好的国家靠拢。

在 1996 年至 2016 年期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参与率较低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将该比例平均提高了大约 12 个百分点。在过去的 10 年中，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西兰和新加坡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将参与率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以上，与瑞典等国的增长水平齐平，瑞典是发达经济体中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和韩国在既往参与率停滞不前或下降的基础上也实现了些许提升。近年来，上述各国取得的所有进步提高了亚太地区的平均女性劳动参与率。

尽管亚洲女性劳动参与率总体上升，但是各国之间存在的差异也在不断增加。一些国家未能跟上亚洲其他地区的发展脚步。

亚洲各地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差异不断扩大，主要是由于一开始参与率就低的国家的参与率下降或者停滞，尤其是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中国和泰国的参与率尽管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也有所下降。

越南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其高水平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超越了西方发达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国家（见图 2）。同时，20 多年以来，该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一直保持在 70% 上下——如此良好的表现，即便发达经济体也是无可比拟的。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驱动因素

要了解亚洲表现更为突出的原因，需确定其在哪些领域取得了最大进步，这一点很重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年纪较大的工作者所占比例增加，将会降低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因为年长的工作者在劳动力大军中的活跃程度往往比较低。但在亚洲，尽管老龄化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年龄介于 25 岁至 54 岁之间的青壮年女性工作者的参与率有所提高，这是因为年轻工作者（包括男性和女性）入学率的提高推迟了其加入劳动力大军的时间（Anh and others，即将发表）。

总体而言，上述趋势几乎在所有亚洲国家均存在，仅有少数例外情况——尤其是中国、印度和泰国，在这些国家中，青壮年女性工作者参与

劳动的情况有所减弱。

经济周期对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会产生很大影响。增速减缓或者经济衰退会提高失业率，这将导致工作者因丧失信心或技能落伍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其中一些人可能会推迟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以待经济恢复。

近年来，亚洲经济体从强劲的增长中获益，这为女性工作者参与劳动提供了支持，同时也抵消了老龄化的影响。在此方面，亚洲的经验有别于西方发达经济体，后者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同时接踵而至的经济滑坡也拉低了女性劳动参与率，从而加剧了老龄化所产生的压力 (IMF, 2018)。

但是，增长率和老龄化不能完全解释亚洲劳动参与率方面的变化。经济体中的结构性转变以及家庭友好型政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结构和个人特征息息相关，同时，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制度不仅对总体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也对女性工作者产生了特定的影响。这些因素影响人们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决策，同时也会影响雇主的雇用决策。相关驱动因素包括：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加平等的劳动权利、较低的青少年生育率、儿童保育的可得性和经济可承受性，以及影响女性参与的文化态度。

相关政策的影响可能会由于经济体结构以及所处经济和制度发展阶段而存在差异。例如，在更为发达的经济体中，城市化和受高等教育的程度常常与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相关，因为城市服务行业的就业岗位对女性的技能要求都较高。上述因素与低收入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相关性较弱，因为在这些国家农村（农业）中的非正规就业率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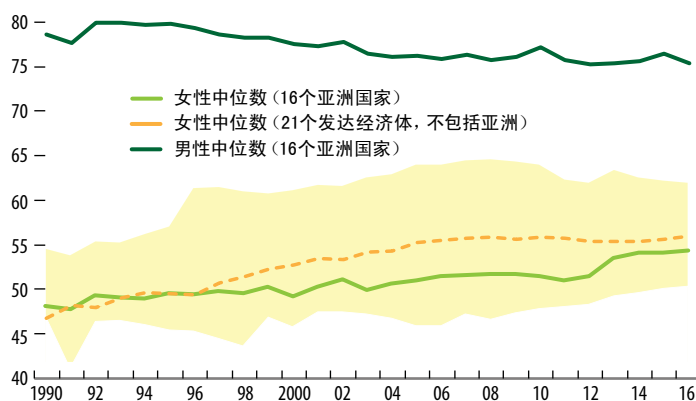
本文所探讨的这些亚洲国家覆盖了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具备不同劳动力市场禀赋以及不同政策和制度设置的各类国家。一般而言，由于某些因素仅对规模较小的国家产生影响，所以在解释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方面，其统计学意义不大。

在亚洲经济体中，相对于工业行业，规模较大的服务行业（其中包括公共部门）以及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是与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关系最为

图1
呈现逐步上升趋势

亚洲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正在不断提高，接近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但各国之间的差异有所扩大。

(劳动参与率，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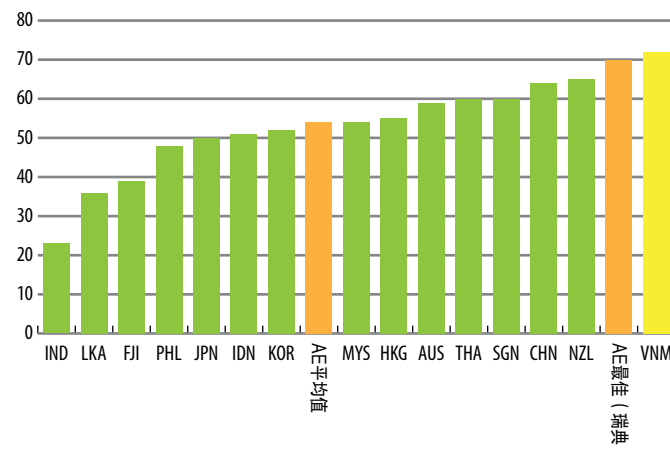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由于数据的不可得性，不包括如下国家的数据：柬埔寨（1990—1991年，2015—2016年）；中国（2011—2016年）；斐济（1990—1995年）；印度（1990年，2013—2016年）；越南（1990—1995年）。阴影面积表示四分位差。

图2
越南表现突出

越南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超过了西方发达经济体中表现最优的国家。

(女性劳动参与率，最近，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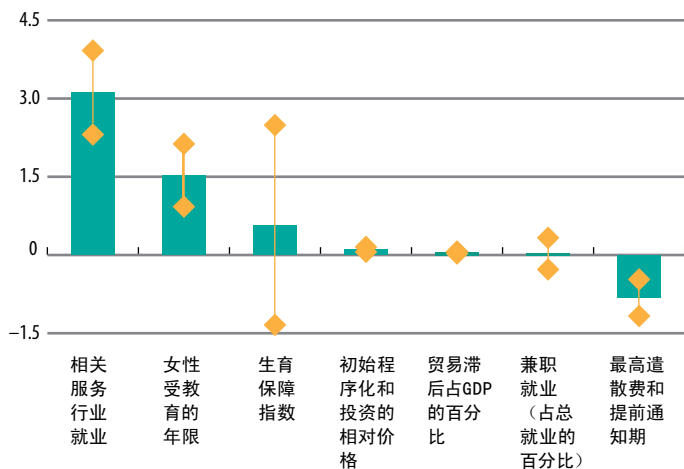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图中数据为2016年的数据。柬埔寨、中国和印度的最新数据年份分别为2014年、2010年和2012年。AE=21个发达经济体，不包括亚洲。图中的数据标签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家代码。

图3
激励因素

受教育水平和服务业就业机会的增加是亚洲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的部分主要原因。

(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平均影响, 百分比)



资料来源: IMF 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 条形代表女性劳动参与率(25—54岁)在变量提高一个单位之后的预估变化。竖线表示90%的置信区间。相关的回归分析均包括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

密切的因素(见图3)。鉴于亚洲国家的多样性, 其经济的开放性(通过贸易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以及城市化的速度(未显示)一般而言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影响较小。

尽管自动化(或者程序化)对一些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产生了负面影响, 但这种情况并非普遍存在于整个亚洲。这是因为, 在某些国家中, 程序化程度相对较低(例如, 鉴于农业所占的份额较高), 同时自动化的成本较高。

针对女性劳动力所面临的特定限制而量身定制的家庭友好型政策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如生育保障、儿童保育以及兼职就业等。但是, 几个亚洲国家中所存在的数据缺口以及庞大的非正规行业限制了其总体影响的规模。此外, 家庭导向型政策的效果取决于依法实施强制规定的制度的能力, 而不同亚洲国家在这方面存在差异。

最后, 劳动力市场刚性化造成企业难以解雇员工, 这对于雇主做出雇用女性工作者的决策产生了寒蝉效应。

越南的特殊情况

越南是如何做到在几十年里保持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呢?

尽管战争使越南成为一个特殊案例, 但是该国的经验对于想要推动女性劳动参与率增长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具有借鉴意义。由于越南的政策选择推动了女性就业, 因此这一初期政策被长期沿用下来, 包括: 经济改革以及大力推进强调性别平等的教育发展。

根据国家经济研究局出版的由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克劳迪娅·奥利维蒂(Claudia Olivetti)撰写的文章, 越南战争助涨了女性劳动参与率, 这与美国在二战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是相似的。

越南战争导致男性人口相对于女性人口急剧下降, 尤其是青壮年人口(见图4)。由于1986年经济革新之后经济开始增长, 而可获得的劳动力主要为女性, 所以大量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也就不不足为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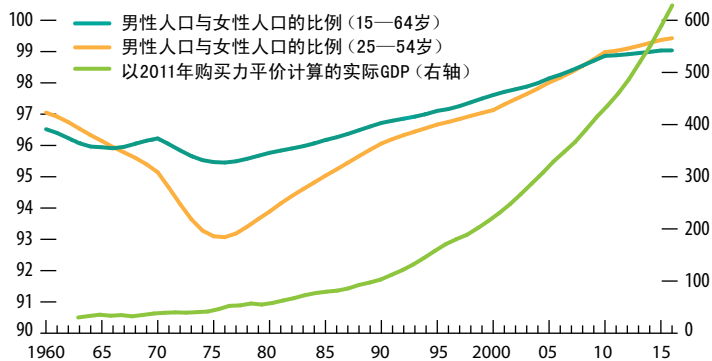
经济革新旨在通过鼓励私人企业、取消价

图4
越南战争的影响

越南战争导致越南男性人口的相对下降, 随着经济开始增长, 所形成的劳动力空缺由女性填补。

(百分比)

(2011年GDP, 购买力平价)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指标》。

格控制并逐步淘汰政府企业以及其他变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述举措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实现了经济贸易的开放，以及快速的城镇化。尽管过去女性劳动力中有很大比例从事农业工作（目前也是如此），但越来越多的女性工薪者加入庞大的服务行业和外商直接投资行业之中。

戈尔丁和奥利维蒂在其文章中表示，战后美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作者中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提高，而技能较低的工作者中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只在短期内有所提高。在越南，经济革新伴随着一项大力推动教育水平提高的举措，即全民教育（EFA）。首个全民教育规划（1993—2000年）强调在各级教育中实现性别平等。上述措施带来了不少好处，它使得战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再是短期现象。

在越南，高等教育中男性和女性的毕业率大致相同。越南是亚洲少数几个将受教育程度方面的性别平等成功转化为劳动参与率方面的性别平等的国家。在越南，让高技能女性成功加入劳动力大军也得益于大量有关儿童保育和生育保障的法律，这些法律有益于家庭生活（见图5）。该国还强化了其法律框架，以保证平等和防止性别歧视。

路漫漫其修远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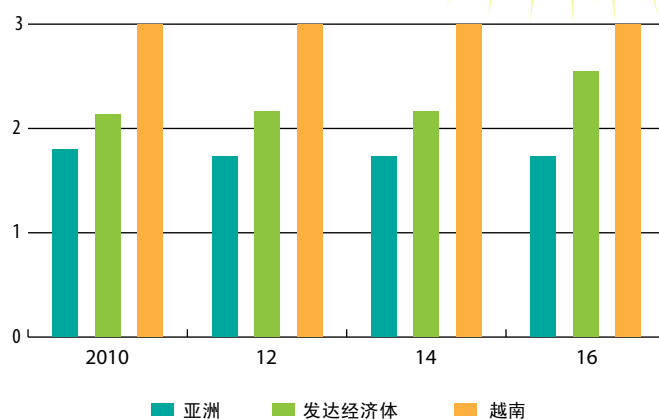
尽管亚洲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正在提高，但是在进一步改进成果并将良好的政策传播到亚洲所有地区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近取得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强劲的经济增长，一旦经济周期转变，可能无法对女性劳动参与率起到支撑作用。随着老龄化和数字化的作用加速，近期所取得的进展也存在反转的可能。

如果我们对参与率数据背后的情况进行深入挖掘，会发现我们需要改善工资报酬差距、高级别的代表以及获得就业等其他维度方面的性别平等，包括越南等表现较好的亚洲国家也不例外。政策细节在不同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差别，这取决于各国的发展水平、制度能力以及文化和社会规范。获得高质量的教育以及家庭友好型法律的有效实施可能对于所有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图5
生育支持

包容的家庭友好型法律帮助更多越南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

（生育支持指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女性、商业和法律》（WBL）；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生育支持指数在1—3之间，其中1表示支持水平较低。指数是三个组成部分之和：（1）母亲在休完产假之后是否保证能获得相同的职位（1=是，0为其他情况）；（2）法律是否对产假有强制性要求（1=是，0为其他情况）；以及（3）由谁来支付产假福利（1=政府支付部分或全部产假福利，0为其他情况）。发达经济体包括21个除亚洲之外的发达经济体。亚洲包括：澳大利亚、柬埔寨、中国、斐济、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斯里兰卡和泰国。

那些保持强劲经济增长的政策也将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稳步提高起到支持作用。FD

安嘎纳·巴纳吉（ANGANA BANERJI）是IMF亚太部的高级经济学家，萨恩迪乐·赫拉茨赫瓦尤（SANDILE HLATSHWAYO）是该部的经济学家，阿尔贝·戈琼巴腊吉（ALBE GJONBALAJ）和安·凡乐（ANH VAN）是该部的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 D. Autor, and D. Lyle. 2004. "Women, War and Wages: The Effect of Female Labor Supply on the Wage Structure at Midcentu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 (3).
- Anh, J., Z. An, J. Bluedorn, G. Ciminelli, Z. Koczan, D. Malacrino, D. Muhaj, and P. Neidlinger. Forthcoming. "Work in Progress: Youth Labor Markets in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 Goldin, C., and C. Olivetti. 2012. "Shocking Labor Supply: A Reassessment of the Role of World War II on U.S. Women's Labor Supply." NBER Working Paper 1867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8.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Advanced Economies: Drivers and Prospects."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April.



隐藏的祸患

东南亚的难民和流亡者
受到人口贩子的侵害，
但是这些犯罪鲜有报道

梅里·萨巴勒罗·安东尼

安全威胁不再局限于军事对抗、领土争端和核扩散，还来自非军事领域的危险，如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传染病和跨国犯罪。在这些非传统的安全威胁中，贩卖人口问题日益凸显，尤其在东南亚地区，自然灾害和军事冲突导致出现大量流亡者和难民，这些人非常容易遭受这一险恶罪行的侵害。

在东南亚及其他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有两大典型特征：跨国性和复杂性。人口贩卖，有时被称作“现代奴隶制”。约有4000万名男性、女性和儿童深受其害，他们陷入强迫劳动、性剥削和强迫婚姻的可怕陷阱中（ILO and Walk Free Foundation, 2017）。据估计，贩卖人口是当今世界最有利可图的有组织犯罪之一，一年可产生1500亿美元以上的利润。根据自由行走基金会（Walk Free Foundation）发布的《2016年全球奴役指数》，2/3的受害者（约2500万人）来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这些令人震惊的数据只是估算数据，因为很难获得准确的数据，而且人口贩卖很难被发现和报道，因此也无法起诉。由于受害者害怕遭受恐吓和报复而不敢寻求帮助，所以贩卖人口一直是一项隐蔽的罪行。受害者，而非犯罪者，往往不仅身体受到虐待，而且还被当作非法移民而遭到起诉。

主要目的地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人口贩卖趋势令人担忧，对这一威胁的处理变得越发紧迫。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发布的《2016年全球人口贩运报告》，超过85%的受害者都是被贩卖到该区域内的各个国家。中国、日本、马来西亚和泰国是邻国人口贩卖的目的地。根据自由行走基金会的《2016年全球奴役指数》，在东南亚地区，泰国是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人口贩卖的

主要目的地。马来西亚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人口贩卖的目的地。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东亚51%的受害者是女性，儿童的比例则将近1/3。

2012年至2014年期间，7800位经认定的受害者中有超过60%的人是性剥削的受害者。女性同时还是家庭奴工和其他形式的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妇女和儿童来自偏远的贫困社区。在柬埔寨、中国、缅甸和越南的湄公河流域，强迫年轻女性和少女结婚的现象非常猖獗。

该区域贩卖儿童数量的增加与网络儿童色情兴起有关，包括性虐待儿童的视频直播。这种暴利的生意一年的利润估计能达到30亿至200亿美元。柬埔寨和泰国等国家已经被认定为儿童色情信息的主要供应商。

据国际移民组织称，许多东南亚的受害者为了寻求带薪工作而迁移，但结果却被强迫从事捕鱼、农业、建筑或家政等劳动。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8年人口贩运报告》，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法偿还非法中介和雇主收取的高昂费用，因此很容易沦为债奴以及遭受其他形式的剥削。在强迫劳动方面，亚太地区是最有利可图的区域（见图）。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渔业中的强迫劳动已经被广泛报道。受害者一天工作20个小时，得到的报酬却极低，或根本没有报酬。

冲突、灾难

很多人因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试图在绝望中寻求安全和保护的人是十分脆弱的，人贩子就在这些人当中选择他们的目标。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东南亚的台风和其他自然灾害越来越猛烈和频繁，导致潜在受害者的数量上升，包

括那些与家人离散或成为孤儿的儿童。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2018年世界移民报告》，自2008年以来，共有2.276亿人无家可归。

2013年，有记录以来最强劲的热带风暴之一台风海燕袭击了菲律宾。据报道，幸存者被强迫沦为家庭奴工、乞丐、妓女和劳力。而受到干旱影响的移民从柬埔寨偷渡到泰国(Calma, 2017; Tesfay, 2015)。这些移民往往从事非法的危险职业，这使他们很容易成为犯罪网络的猎物。然而，虽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加剧了人们进行被迫迁移，但其与贩卖人口之间的关系仍未被探究。国际移民组织注意到，国际讨论或国家层面的政策框架极少将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与贩卖人口联系起来。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2017年人口贩运报告》，缅甸和菲律宾南部的冲突也产生了许多脆弱的难民。逾5000名缅甸罗兴亚族人被贩卖或走私到孟加拉国的多个地区，他们被警察解救，并带回难

民营。据报道，人贩子还对受缅甸内部冲突影响的少数民族实施迫害。该国的喀伦族、掸族、阿卡族和拉祜族妇女被贩卖到泰国实施性剥削，而克钦族妇女作为新娘被卖往中国。武装冲突使儿童更加脆弱。据联合国报道，菲律宾的武装分子，包括摩洛叛军和共产党，有时通过暴力手段招募儿童进行作战或其他非战争活动。

国际协议

为打击人口贩卖，我们采取了那些措施呢？两项国际协议将贩卖人口当作跨国犯罪处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及《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议定书》，又称《巴勒莫议定书》。《巴勒莫议定书》把此类犯罪分为三大构成要素：招募、运输、转移、藏匿和接收人员的行为；使用暴力和其他形式的强制手段，如诱拐和欺骗；以卖淫、强迫劳动和奴役以及摘除器官为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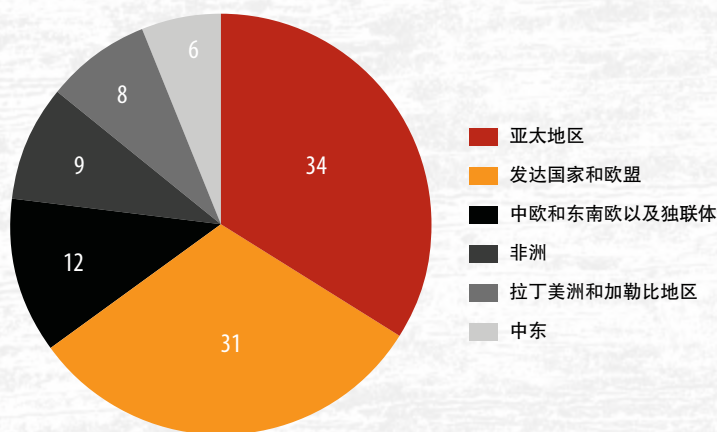
反拐卖制度的核心是通过控制非法移民的人数来保护边境。《巴勒莫议定书》第11条要求各国加强边境管制，防止和侦察人口贩卖，并制定法律来防止利用商业运输进行人口贩卖。保护国家安全，免受人口贩卖的侵害也是在帮助各国对抗其他相关的犯罪，包括走私、卖淫、器官贩卖和洗钱。

除这两项国际法律制度外，2015年东南亚各国签署了《东盟反对人口贩运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公约》。这一文件是对国际反拐卖框架的补充。在次区域层面，“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拐进程”遵循《巴勒莫议定书》框架，已促使大湄公河区域的各个国家之间达成数项双边协议，展开进一步的合作。在东南亚之外，“巴厘进程”创建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国家间对话的平台，其目标是提高打击人口走私、贩运和跨国犯罪的意识和能力。因贩卖人口具有跨国性质，国际和区域制度应鼓励各国

有利可图的交易

据估计，贩卖人口是有组织犯罪中最暴利的犯罪形式之一，在全球范围内一年可产生1503亿美元的利润，其中亚太地区是最有利可图的。

(估计贩卖强迫劳工产生的年均利润，占全球利润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5. Profits and Poverty: The Economics of Forced Labor. Geneva.

受害者需要获得法律保护、医疗服务和临时避难所。

政府共享信息，通过协调政策和工作将贩卖人口的行为定罪，提供司法互助，保护受害者，并对罪犯提起诉讼。

腐败官员

巨大的挑战依然存在，尤其是严重缺乏关于人口贩卖的规模和范围的准确和可靠的信息，因此很难衡量反拐政策的有效性。法律框架和国家层面对相关法律的执行力度之间的差距也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出现。虽然有政治意愿，但执法部门缺乏技术、知识和资源来了解和应对日益复杂的贩卖人口行为。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腐败的政府官员和犯罪网络相勾结。据悉，人贩子在招募受害者和将他们运出边境的过程中获得了腐败官员的帮助。2015年在马来西亚和泰国边境沿线发现了大量受害者的墓地，这就是腐败的可怕的证明。根据新闻报道，有62人参与了与此案有关的人口贩卖和其他犯罪活动，其中包括一名泰国将军和部分警察。

最后，人口贩卖的受害者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和援助。关于反拐制度的一个常见的批评是，大多数的精力都集中在给人贩子定罪和起诉上，而不是预防犯罪和保护受害者。关注定罪和起诉可能有助于提高意识，但是要预防人口贩卖，还需做出更多的努力，如进行有效的执法以及向易受害群体宣传其危害性。

同样地，还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来解决受害者的需求。除了保护人身安全以外，受害者需要获得法律保护、医疗服务和临时避难所，也需要

有人帮助他们回国或融入当地生活。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强调，需要帮助受害者克服人口贩卖的创伤和污名，并建立其对执法的信任，这样受害者们才会愿意寻求帮助，并且在起诉人贩子的时候进行合作。

打击人口贩卖的战斗需要制定更好的国家刑事司法体系来有效地实施反人口贩卖的法律。同时，还要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多轨道途径，以解决人口贩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驱动因素。这项挑战的复杂性决定了它不是依靠单方面的力量就可以解决的，比如国家单方面的努力，而且也不是只关注问题的某一个方面就可以解决的，如性剥削或强迫劳动。要寻求一个综合的、更加以人为中心的途径来解决问题，我们就要更加深入地挖掘贩卖人口的其他原因，包括贫困、严重的剥削和政治迫害。这需要政府间和民间团体、私营部门以及IMF的积极参与和合作。**FD**

梅里·萨巴勒罗·安东尼 (MELY CABALLERO-ANTHONY) 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副教授及负责人。

参考文献：

- Calma, Justine. 2017. "Climate Change Has Created a New Generation of Sex-Trafficking Victims." *Quartz*, May 2.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and Walk Free Foundation. 2017. *Global Estimates of Modern Slavery: Forced Labour and Forced Marriage*. Geneva.
- Tesfay, Netsanet. 2015. *Impact of Livelihood Recovery Initiatives on Reducing Vulnerability to Human Trafficking and Illegal Recruitment: Lessons from Typhoon Haiyan*. Geneva: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沸点

当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地区遭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激烈的增长

阿米特·普拉卡什

越南会安是一座很受欢迎的小镇，以亮黄色的房子而闻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蓝龙是会安临河的一家小饭馆，在这里可以买到2美元一份的炸脆春卷和多汁的米粉，也可以打探到一些当地的琐事。在潮湿斑驳的墙上，蓝龙饭馆的老板南记录下了每年洪水淹没这座小镇时的水位。

去年11月，各国元首和总理来到附近的岘港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会议。在这之前，台风带来的降雨冲刷了这座城市，蓝龙的水位涨到了1.6米（5.25英尺），客人们慌忙地朝安全的地方跑去，锅碗瓢盆漂得到处都是。

“每次有大雨或台风的时候就会涨洪水，所有的店都要关门三到四天，”65岁的南说，“去年，人们不得不坐着船逃跑，因为水位实在是太高了。”

由于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方最先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该地区的台风和洪水来得越来越猛烈和频繁。长长的海岸线和人口密集的低洼地区使得这个拥有逾6.4亿人口的区域成为世界上最易受全球变暖引起的极端气候和海平面上升侵害的地方。政府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否则过去几十年来通过出口带动发展而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就要被打回原形。

东南亚面临着双重挑战。该地区不仅需要

适应主要由发达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所引起的气候变化——近期则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排放的——它还必须改变发展战略，避免加剧全球变暖。该地区对煤和石油以及森林砍伐的依赖不断增长，这正在破坏国家对控制排放和使用清洁能源的承诺。

经济影响

1960年以来，东南亚每十年的平均气温一直在升高。根据环保组织德国观察发布的“全球气候风险指数”显示，越南、缅甸、菲律宾和泰国都位于过去20年间全球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10个国家之列。世界银行把越南列为5个未来最可能受全球变暖影响的国家之一。这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亚洲开发银行（ADB）估计，东南亚可能遭受比全球其他地区更加严重的损失。亚洲开发银行在其2015年的报告中预测，如果不加以抑制，随着气候变化对农业、旅游业和渔业等关键领域，以及人类健康和劳动生产力造成重大损害，到本世纪末，气候变化可能会造成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1个百分点。这比2009年估计的6.7个百分点高出不少。



照片:ISTOCK/HARVERINO



人们用推土机清理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丛林腹地的一条新建的道路。

能源结构

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IEA) 预计, 到2040年, 对能源的需求将增长66%。仅是对煤的需求就占到了增长量的近40%, 在能源结构中超过了清洁的天然气。这不利于《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目标的实现, 即把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2摄氏度以内。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东盟)的10个成员国都签署了《巴黎协定》。

“以目前的速度, 东南亚, 加上印度和中国, 会抹灭世界其他地方的能源效率和减排的效果,” 亚洲开发银行的首席气候变化专家斯里尼瓦桑·安恰(Srinivasan Ancha) 这样说道。

对煤的需求的增长部分是由于该地区煤的产量相对丰富, 并且与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相比, 其价格较为低廉。燃煤发电厂的融资也比可再生能源项目更为容易。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第五大产煤国、第二大煤净出口国, 马来西亚和泰国则分别是第八大和第九大煤净进口国。

根据塞拉俱乐部和绿色和平等环保组织2018年3月的报告, 预计对煤的依赖会增长: 越

据亚洲开发银行和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2017年的研究称, 到本世纪末, 该地区可能会发生转变, 形成一个“新气候格局”, 届时夏季最凉爽的月份也要比1951年到1980年夏季最炎热的月份还要更热。如果没有技术突破,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2100年的水稻产量将比1990年的产量低50%。更加炎热的天气还会带来热带疾病, 如疟疾和登革热等, 这些疾病将蔓延至老挝等之前这类疾病并不流行的北部国家。

按人均计算, 东南亚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比发达国家低, 但由于其对煤和石油的依赖的增加, 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1990年到2010年间, 东南亚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比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快。

南积极建设中的煤电容量位居世界第三，紧随中国和印度之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分别位列第五和第十。

消失的森林

砍伐森林是造成温室效应的另一个主要源头。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世界上最大的林地的故乡，人们砍伐树木来发展农业，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他们生产纸浆、纸和棕榈油等来获得出口收入。砍伐森林导致的排放占到印度尼西亚排放总量的一半左右，比化石燃料还多，尽管后者也正在快速增长。

砍伐泥炭地和泥炭沼泽的森林会导致额外的问题。因为泥炭沼泽在逐渐枯竭的过程中每公顷土壤会释放上千吨二氧化碳。当农民们焚烧干的泥炭时，气体释放得更快，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自1997年以来，焚烧产生的浓烟已经多次影响到邻近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据路透社称，最近一次焚烧发生在2015年，产生的排放量比整个欧盟还多。

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加剧了气候变化，同时也扩大了它的影响。来自农村地区的移民涌入城市，产生了更多的热量。洪泛区的新建设阻挡了水道，让城市更易受洪水的侵害。城市规模越大，受到越来越频繁的洪水和暴雨的损害就越大。

“必须要解决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此外，还有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方面的问题。”河内防洪风险管理专家马塞尔·马钱德（Marcel Marchand）说，“现在洪水或暴雨的影响通常比过去更大。这不仅是因为危险变多了，或者危害更严重了，还因为人口更多了，城市更大了。”

马钱德正在为一个7000万美金的国际融资项目提供咨询，该项目可以为会安居民提供更及时的洪水预警。他认为，洪水发生的部分原因是上游集水区的水库建设改变了河道水流。水库无法承受极端降雨的水量，溢出的洪水淹没了下游的会安和附近的岘港。

这两座城市都是发展迅速的旅游胜地，吸引

了许多移民来此寻找工作。十年前，越南第四大城市岘港只有一家豪华度假酒店，而如今有近90家四星或五星的酒店，其中多数建在通往会安的延伸30公里的滨海公路旁。劳动者的流入壮大了岘港的人口。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20年其人口将从现在的100万人激增至165万人。

城市规模越大，受到越来越频繁的洪水和暴雨的损害就越大。

在旅游业创造了就业的同时，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间接加剧了对海岸的侵蚀，这使得该地区更易受到风暴潮和海平面上升的侵害。根据广南省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从2004年到2012年，会安热门的楚带海滩的海岸线后退了150米。防洪石堤和沙袋对度假者来说有些有碍观瞻。

“过去20年间，降雨模式发生了变化，降雨量大大增加。”冯德兰（Phong Tran）说。他是国际社会和环境变迁研究所（ISET-International）的技术专家，与几个越南城市合作研究如何提高气候适应力。

干旱期

冯德兰担心海平面上升伴随延长的干旱期，会导致海水入侵，对富饶的湄公河三角洲——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的农业造成危害。据位于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称，这个三角洲是越南的粮仓，为越南生产了超半数的水稻和其他作物，以及超过60%的小虾。

越南约70%的人口居住在其3200公里的海岸沿线以及低洼三角洲。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具有相似的隐患。

印度尼西亚有着世界上最长的海岸线，长达54700公里。在菲律宾，36300公里的海岸线每年平均有20次台风登陆，造成的破坏越来越大。柬埔寨、老挝和泰国同样也受到暴雨和过量降雨的影响，极端高温也给农业和人们的健康造成了

很大的损害。

东南亚各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威胁的严重性，决心要降低排放量。它们也意识到了推进低碳发展战略的必要性。东盟的领导者们通过了一项计划，目标是到 2025 年区域能源结构中的可再生能源比重从 2015 年的 10% 提高到 23%。控制森林砍伐也出现在各国各地区的重要政策议题之中。

然而，这些减排承诺是有附加条件的，即要求获得国际资金的支持。印度尼西亚承诺到 2030 年实现减排 29%，并称在获得外界支持的情况下，该目标可以提高到 41%。越南对应的目标分别是 8% 和 25%。菲律宾承诺在获得资金支持的前提下减排 70%。即使这些带有附加条件的承诺最终得以兑现，但也无法实现《巴黎协定》对控制全球变暖的设想，因此还需要设立更高的目标。

尽管该地区对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和风能的使用增多，但由于其发电容量有限，各国依然依赖化石燃料。随着各国政府试图普及电力和石油类燃料用于做饭和交通，各种燃料的消耗正在增多。国际能源署估计，东南亚有 6500 万人口缺乏电力，有 2.5 亿人使用生物燃料作为生活燃料，如木柴和动物粪便等。

国家关于减少化石燃料使用的目标通常与其补贴石油产品成本的政策相冲突。

政策冲突

国家关于减少化石燃料使用的目标通常与其补贴石油产品和电力成本以保障社会最贫困阶层的利益的目标相冲突。亚洲开发银行—波斯坦研究所的研究预计，这样的补贴不仅会增加对燃料需求，使得清洁燃料和可再生能源更加不具竞争力，还会导致各国政府不堪重负，难以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

考虑到削减补贴和鼓励采用低碳技术在政策上和实践上存在困难，阻止砍伐森林可能是减

排最有效的方式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通过碳信用额度赚取了上亿美元；保护森林比大幅削减化石燃料排放和买入碳信用额度更加划算。

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分析师称，印度尼西亚 2011 年实施的伐木禁令阻止了对某些原始森林和泥炭地的砍伐，仅此一项每年就可减少 1.88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大约相当于法国 2016 年总排放量的 60%。该机构 2017 年的工作报告还称，提高农业生产力可以减少砍伐森林。

全球玩家

随着太阳能和风能成本的降低，推动了当地制造业的投资，国际能源署将价格实惠的低碳技术看作获取更高效的能源的途径。例如，在那些试图绕开欧盟和美国反倾销税的中国投资者的帮助下，马来西亚和泰国正快速成长为太阳能电池板制造的全球玩家。

今年美国宣布对太阳能电池板进口实施新关税计划，以制裁所谓中国企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在此之后，马来西亚和泰国可能需要寻求新的市场。但自本世纪以来，东南亚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投资已大幅增加，该地区成为此类产品的巨大的潜在市场。尽管如此，要想提高在可再生能源

方面的投资，推广使用高效节能的技术，还需要实施税收减免、免税进口和优惠贷款等激励措施，以及提供更加便利的融资渠道。

“只有政策和建议是不够的。”越南国际社会和环境变迁研究所的冯德兰说，“企业需要激励措施来促使其采用可再生能源或环保技术，鼓励重新造林的情况也是如此。” **FD**

阿米特·普拉卡什 (AMIT PRAKASH) 是新加坡记者，同时还是内容与通信咨询企业 FINAL WORD 的创始人。

传递接力棒

东南亚的年轻人拥有比其父母更加光明的未来，他们已经准备好走向世界

耶利米·奥弗曼、维娜·萨拉查、根邦·努桑塔拉

东南亚超过一半的人口年龄在 30 岁以下。科技塑造了这个地区年轻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们甚至将科技融入到独特的环境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年轻人会继承一个比他们的父母所认知的更好的世界，拥有更好的收入潜力，享受更好的教育机会，以及技术带来的无限可能。但他们也会面临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以及开放和人权方面的挑战。下文让我们得以一窥三个东南亚青年的生活，看看他们如何追寻未来的梦想。

灯火辉煌、大城市

斯雷尼特·哈克有点像个怪人。因为和她一块长大的村里的朋友们都结婚了，其中有些是包办婚姻。“我不会去评价他们，因为他们过得很幸福。”但是，这不是她的生活。

哈克，25 岁，八年前搬到柬埔寨首都金边，攻读媒体管理学士学位。“我喜欢听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作为自由编辑和电影制片人的她这样说

道。比起她父母和兄弟姐妹依然居住的故乡小镇，金边为她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我们能看见更广阔的世界；能够做我想做的事情。”她说。

哈克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将她和柬埔寨其他的劳动妇女区分开来。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柬埔寨促进妇女经济赋权项目”，2014 年，84% 的 15 岁以上的职业女性只有小学以下学历，而职业男性的这一比例是 76%。

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哈克勉强能维持生



上图，斯雷尼特·哈克和同事在讨论一个视频项目；右图，哈克在故乡农村父母家中享受片刻的宁静。



照片：SAM JAM

活。她每个月都要存钱，以防自己的项目渠道中断而无收入。“你每个月花钱必须是有弹性的。”她说。她微薄的收入仅供支撑简单的娱乐——去看展览、做瑜伽、用手机 APP 订晚餐，以及攒钱旅游。

作为在大城市追寻更好生活的人，哈克并不孤单。据亚洲开发银行称，从农村移居城市的妇女中有近 60% 去了金边。但是，尽管贫困率下降了，由于受社会流行的风气的影响，而且女性比男性获得的资源和工作机会更少，因此柬埔寨女孩和妇女的弱势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反而增强了。

尽管哈克既坚强又独立，但她依然感觉处于弱势。她说，在柬埔寨，男女并不平等。有时她录制视频到很晚，在回家的路上会遭遇男性的骚扰。她说她的父母更希望她找一份领固定薪水的工作，过更传统的生活。

但是，哈克的母亲，一位父母被红色高棉迫害的教师，接受了她的选择。她知道，比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女儿的前途要光明得多。她没有给女儿施加压力，让她回家。能在女儿偶尔回乡时见到自己的女儿，她已经很满足了。现在路修得更好了，回乡也更容易了。

哈克很有耐心。她在首都享受生活的同时，也渴望着某天能获得职业上的成功。她说：“我有自己的想法和安排。我想证明给大家看我能做到，甚至能做得比其他人更好。”

耶利米·奥弗曼（JEREMIAH OVERMAN）柬埔寨金边报道

最后一根吸管

波切罗·埃斯皮纳，22 岁，一直认为自己长大后会成为一名医生或律师。然而，这个年轻的马尼拉人最终成为 Sip PH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一家制造和销售不锈钢吸管的公司。

这一切要从埃斯皮纳在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念书的时候说起。当时他对“零浪费”运动很感兴趣，该活动鼓励人们重复使用各种产品，推崇把填埋垃圾的量降到最低的生活方式。埃斯皮纳发现很难找到金属吸管，所以他批发了一些来自己用，并把剩下的卖了。他发现这种产品的需求很大，于是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 40000 比索，开了一家生产可重复使用的金属吸管的企业，供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者使用。

波切罗·埃斯皮纳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远离塑料废弃物，从一只吸管做起。



照片: VINA SALAZAR

放弃使用塑料吸管是普通人每天都可以做到的一点小小的牺牲。

至今 Sip 依然只是一家小规模的公司，但是埃斯皮纳的客户规模已经从口口相传的极小的客户群体发展到了由社交媒体和马尼拉几家店铺带来的上千笔订单。今年早些时候，他接受了 CNN 菲律宾的采访。

埃斯皮纳练习浮潜，他把这看作保持国家海洋和航道清洁的个人使命。“菲律宾位于世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中心地带。”他说道。菲律宾由 7641 个岛屿组成，位于“珊瑚三角区”，这个区域被看作是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中心地带，覆盖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部分水域。

这片区域的海洋生物不仅有珊瑚礁，还有海草床、红树林和滩林、鱼类、其他无脊椎动物、海藻以及海洋哺乳动物。埃斯皮纳说：“一旦你亲眼看到它的美，就会明白为什么你有足够的理由去保护它。”

菲律宾禁止垃圾焚烧，因此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成为主要的挑战。（Sip PH 的网站称，菲律宾

是世界上第三大海洋塑料处理国。）塑料废弃物的问题越来越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全球连锁咖啡店星巴克刚刚宣布他们将逐步淘汰难以回收的塑料吸管的计划，其他商家也纷纷效仿。

埃斯皮纳对环境的关心在他这一代很典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全球杰出青年调查，近一半的年轻人把气候变化和对自然的破坏列为影响当今世界最严重的问题。IMF 发现，气候变化不仅对健康有害，还会造成相当大的潜在经济损失。

比起试图解决塑料废弃物这么大的问题，埃斯皮纳决定把注意力放在一个更小的、更可控的问题上。他认为，放弃使用塑料吸管是普通人每天都可以做到的一点小小的牺牲。

从长期来看，埃斯皮纳希望能更多地投入环保事业。但是，现在他必须要守住底线。“人们常问，对于社会企业来说，什么更重要——社会层面还是企业层面？好吧，必须是企业层面，因为没有企业就没有社会影响。”

维娜·萨拉查（VINA SALAZAR）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上图，苏霏安·查悦诺在休息间歇查看信息。右图，他自豪地展示自家农场的西兰花。



PHOTO: GEMBONG NUSANTARA

农业的未来

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年轻人都离开了农村，选择在城市生活。但22岁的苏霏安·安迪·查悦诺决定利用新技术和先进的耕作方法，对他父亲的位于中爪哇省高原地区的农场进行现代化改造。

查悦诺家世代务农。对于从事农业的爪哇人来说，土地是需要传承下去的重要东西，是留给下一代的遗产。“这里的土壤非常肥沃，因为这些火山土。”查悦诺一边展示松软的土质一边说道。

他说：“务农被看作是低端职业，但是我要改变这一观点。”

最初他并不愿意从事这一家族事业，但在沙塔亚瓦札那基督教大学学习了农业技术后，他改变了主意。他说，自己所面临的挑战与前几代人相似，但现在有了更多的解决方案。他和他的家人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来出售他们的产品，不需要经过中间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给出更有竞争力的价格，并获得更多的利润。”查悦诺说。他们的农场把产品卖给饭店、咖啡厅、酒店和超市。

过去，他的父亲种蔬菜从不精确计算成本和利润。如今，查悦诺与每个大城市的经销商都有联系，使用一个预定系统来帮助他们管理生产。“如果客户想买我们的产品，他们就会通过WhatsApp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进行采摘、打包、

发货。我们的产品送达目的地时都很新鲜。”他说。

在整个亚洲，像查悦诺这样的农民开始利用数字技术提高效率，获取更加精确及时的关于市场、存货和农作物的信息。有人甚至使用无人机来采集图像，从而分析预测产量、识别农作物病害和评估施肥需求。

同时，随着亚洲新兴中产阶级对农药存在的健康危害问题越发谨慎，有机农业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印度尼西亚有越来越多的咖啡厅和饭店提供有机水果和蔬菜，这为查悦诺这样的农民提供了机遇。

查悦诺也享受种植各种有机蔬菜过程中的创造性。“我城里的朋友们在上班和回家之间周而复始，他们的日子毫无创意，这使他们感到无趣，”他说。

查悦诺想要传播这一消息，向其他年轻人宣传先进的耕作方法。

“我想要分享我的知识，让更多的人知道农业是很有前景的。”他说，“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也能受到启发，成为农民。” **FD**

根邦·努桑塔拉（GEMBONG NUSANTARA）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巴布市报道

点击WWW.IMF.ORG/FANDD，观看有关这些年轻人的视频



亚洲的 数字化革命

新的一波数字化创新浪潮正在重塑亚洲，并提升该地区的增长潜力

塔辛·萨迪·赛迪克

亚洲正在拥抱数字化革命。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等公司目前正在为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从电子商务到金融科技和云计算等各类服务。在印度尼西亚，GO-JEK 公司所提供的服务涵盖约车、物流和数字化支付。

上述公司以及其他亚洲公司正在利用近期人工智能、机器人学、密码学和大数据等领域的研究进展，因为这些进展有望重塑全球经济并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就像蒸汽机和电力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所带来的重大改变那样。在亚洲以及全球其他各地，数字化革命正在波及各行各业，从零售业和银行业到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

东南亚将面临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挑战，因为新技术正在颠覆全球价值链——即由用于产品生产和服务的相互连接的生产阶段所组成的网络——并对劳动密集的且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

产生破坏作用，一直以来制造业都是该地区增长的驱动力。但是，新技术也将为小型企业打开机会之门，并提供提高生产效率的可能性，这是东南亚为了超越中等收入状态所需要的。对于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前沿经济体而言，数字化技术可能会成为努力消除贫困的新的强有力工具。

处于前沿的亚洲

亚洲在数字化的几乎所有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不过有一些经济体处于显著落后的状态。亚洲经济体分布在各个收入区间，与之相对应，该地区在数字化技术应用方面的分散程度是最高的，其中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全球的潮流创造者。但在任何给定收入水平，亚洲经济体与其全球可类比国家相比，均处于前沿地位。此外，即便对于柬埔寨和尼泊尔等相对贫困的亚

电子商务不仅有潜力支持增长，同时也能够提高增长的可持续性。

洲经济体而言，其数字化进程也在加速。

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是亚洲居于领先地位的其他领域。例如，大约十年前，中国在全球电子商务零售交易额中所占份额不足 1%，但现在该份额已经上升至 40% 以上。中国的电子商务在全部零售销售额中所占百分比目前达到 15%，而美国为 10%。电子商务的渗透率在亚洲其他国家相对低一些，但是增长迅猛，印度、印尼和越南尤为突出。在印尼，Bukalapak、来赞达 (Lazada) 和 Tokopedia 等电子商务平台正在争夺东南亚的最大电子商务市场。

在金融科技领域，亚洲经济体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许多情况下是以跃进的方式进入了新的技术类别。例如，2016 年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个人移动支付总额达到 7900 亿美元，是美国的 11 倍。

技术进步可通过推动生产效率和增长率提升以及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的方式带来巨大的收益。在亚洲大部分国家，信息和通讯技术 (ICT) 在 GDP 中所占份额的提升速度要远远高于经济增长。2005—2015 年，印度、中国和泰国的 ICT 增长率分别平均达到 15.9%、13.7% 和 7.1%，远远超过其 7.7%、9.7% 和 3.5% 的经济增长率。在日本，ICT 增长率几乎是其 GDP 增长率的 4 倍。

同时，在许多亚洲经济体中，数字化正在成为 GDP 的一个更大的组成部分。在全球 ICT 占 GDP 比值最高的 10 个经济体中，有 7 个位于亚洲，其中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数字化也可以推动其他行业生产率的提高。我们的实证工作表明，中国经济数字化提升 1 个百分点，其 GDP 将增长 0.3 个百分点。重要的是，亚洲的创新是向数字化行业倾斜的：如果我们按照 ICT 在全部专利中所占比例对国家进行排序，则亚洲经济体占据前五名的位置——这进一步凸显了数字化在推动未来增长方面的潜力。

电子商务不仅有潜力支持增长，同时也能够提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对于消费者而言，电子商务可能意味着以更低的价格获得范围更为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从而最终推动消费增长。麦肯锡公

司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尽管中国 60% 的网上消费是从传统零售业转移过来的，但有接近 40% 属于新消费。

对于公司而言，电子商务提供了新的商业机会以及进入更大市场的机会，从而为投资提供支持。我们的分析表明，在亚洲，在公司层面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 30% 以上与参与线上商务相关，这部分产出增长是无法通过以传统方式衡量的劳动力或资本等生产投入来解释的。创新、人力资本和融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有助于提高网络公司的表现。最后，我们发现，从事电子商务的公司也能将出口额提高 50%。

金融科技也可以通过加强金融开发、包容性和效率来对潜在增长和减贫提供支持。金融科技可以帮助数百万个人以及中小企业以跳跃的方式和可接受的成本获得金融服务，这种情况在贫困国家尤其突出。这些技术也可以推动金融行业取得显著的效率提升。例如，此类技术所提供的跨境支付服务可以同时为参与者降低风险和成本。根据我们的分析，如果所有金融包容性较低的亚洲经济体能够发展到处于亚洲新兴市场前沿的泰国的水平，则 2000 万人口将可以摆脱贫困。

最后，数字化为改善公共财政带来了机会。政府采用数字化可以更好地进行交易报告，从而提高来自增值税、关税和其他来源的收入。我们的研究显示，如果亚洲经济体发展到全球中等水平，则其增值税收入将增加，占到 GDP 的 0.6%。对于那些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而言，估计其增长可达到 GDP 的 1.2%，而对于通常已经超越了上述前沿的亚洲小国来说，收入增长大约可达到 GDP 的 2.5%。

这些新技术正在为日益复杂的活动实现自动化，而这些活动之前仅能由人来完成。重大转型即将来临，这些转型的规模堪比农业和制造业的历史转型，这为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新的挑战。这轮新的创造性破坏将实现工作和技能的转型，旧有的工作和公司将消失，而新的岗位和公司将兴起。在历史上，针对变革进行调整一直是一项艰

巨的工作，而且收入的分配又不均衡。如果被取代的劳动者没有其他新的替代性机会，则有可能加剧不平等。新的自动化潮流也隐含着推高结构化失业率的风险，尤其是对于年龄较长的工作者而非熟练工作者而言。

在通过工业机器人实现自动化这一领域，亚洲明显处于前沿地位，该地区使用的工业机器人占全球总数的2/3。在研究中，我们针对使用机器人对亚洲、欧洲和美洲大量样本国家的就业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与一些观察者的最大的担忧相反，我们发现机器人可提高生产效率（并因此创造工作岗位），这一影响可能已经抵消了对旧有工作的破坏。

不过，仅针对亚洲而言，机器人对总体就业产生了轻微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电子和汽车等高度自动化的行业。此外，与其他大洲一样，我们发现与教育水平较低或较高的工作者相比，具备中等教育程度的工作者更加容易被取代，其原因在于最易于受到自动化影响的工作往往涉及那些由具备中等技能的工作者所完成的程序性工作。在日本，由于劳动力规模逐渐缩减，制造业中机器人密度的增加不仅仅与更高的生产率相关，也与本地就业率和工资的增长相关（见“机器人崛起的国度”，《金融与发展》2018年6月号）。日本的经验表明，未来将面临类似人口趋势的中国、韩国和泰国等国也将从自动化中获益。

展望未来，一些最新的数字化技术能够重塑全球价值链，而迄今为止，亚洲经济体一直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亚洲传统制造业一直依赖成本较低的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但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3D打印预计将降低与工资相关的竞争性，从而实现制造业性质的转变并可能导致生产回流到发达经济体的局面。一些观察性的证据表明，这种回流已经开始形成，那些具备大规模低技能劳动力池的经济体可能会面临重新设计新的增长模式的压力。

金融科技如果破坏竞争、货币政策、金融稳定性和完整性以及消费者和投资者保障的话，也将为金融行业带来风险。此类技术可能会颠覆现有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并导致业务活动游离于监管行业之外。我们发现，在那些更加倾向于技术跃进式发展的国家中，传统金融基础架构——

尤其是银行分支机构——的水平更容易出现下降。与美国不同的是，亚洲的技术巨擘业已成为金融服务的主要提供商，对传统金融机构施加竞争压力，这一点在中国尤为突出。加密数字资产是亚洲一直处于领军地位的一个行业，该行业可能带来与洗钱、逃税、规避资本管控以及其他形式的非法活动相关的风险。

尽管数字化平台可能放大电子商务的收益，这些平台也引发了竞争问题。规模经济可能会导致胜者通吃的局面并造成反竞争的担忧，这种情况在电子商务平台壮大之后尤为突出。网络效应也给零售商和供应商转换平台加强市场支配力增加了挑战。数字化平台还可以导致税基侵蚀的风险。例如，爱彼迎和优步等P2P平台（或者亚洲的竞争公司，如GO-JEK、Grab和Tujia）允许正常开展高税率或高度监管行业的交易，比如出租车或酒店服务，从而实现避税或偷税的目的。

达到适当的平衡

尽管数字化革命不可避免，但所获得的结果——乌托邦或反乌托邦——都将取决于政策。应对政策应在促进数字化进步和应对风险之间达到适当的平衡。利用数字化红利的政策包括：改进教育，以满足对更为灵活的技能组合和终生学习及新的培训的需求，尤其是针对受到最不利影响的工作者；减少工作者和工作岗位之间的技能错配；投资于可激励竞争和创新的实体和监管基础设施；以及应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挑战，如收入再分配和安全保障网络。

考虑到这些技术本身已经做到了全球性覆盖，区域和国际合作将成为制定有效应对政策的关键。社会对那些后进者提供支持的意愿越强，其适应创新的步伐就越快，而且仍然能够确保所有各方均获得提升。通过实施适当的政策，数字化革命可能会成为亚洲和全球增长与繁荣的新的引擎。^[1]

塔辛·萨迪·赛迪克（Tahsin Saadi Sedik）是IMF亚太部的高级经济学家。

本文基于IMF即将出版的《区域经济展望：亚太地区》中的一章。

处于尖端位置

东盟国家有望成为第一数字经济体，但仍面临一些核心挑战

本土打车软件、智能交通系统、先进的施工技术以及能源消耗自动化管理都推动了东盟国家创新浪潮的兴起。

例如，印尼充满生机的数字生态系统拥有1700多家初创企业，这是全球最大的新企业集群之一。举例来说，GO-JEK从打车软件发展成为一个提供移动支付和其他数字服务的平台。在新加坡，Sea是该地区最具价值的初创企业，价值数十亿美元，它最初是一家在线游戏公司，之后业务扩展到移动货币和购物领域。

东盟的人口结构很年轻（其6.43亿人口中超过一半的人口年龄不到30岁），其经济规模为2.8万亿美元。东盟的10个成员正朝着更广泛深入的经济一体化方向迈进。该地区应处于数字领域的尖端位置。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

在文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互联网覆盖了大多数人口，但在柬埔寨、老挝和缅甸，70%的人口无法接入互联网，不能完全参与到数字经济

当中。宽带高速网络则更是稀缺。东盟落后于中国、日本和韩国，主要是因为成本高昂。新加坡是唯一的例外。

发展数字经济取决于五个关键的优先事项：(1) 互联网连接必须具有普遍性且可负担；(2) 商业环境必须鼓励竞争，从而刺激创新；(3) 教育体系必须使工人的技能适应数字化未来新的需求；(4) 需要有一个更强大的安全网来保护被自动化取代的群体；(5) 东盟国家应寻求通过技术改善金融包容性，并调整其监管框架，以管理与金融科技相关的风险。

作为一个区域集团，东盟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数以亿计的年轻人都渴望能够加入到这场数字革命当中，现在正是解决数字鸿沟的最佳时机。该地区的未来将取决于此。[FD](#)

本文由IMF信息部的信息官员冯佳撰写。

数字潜力

由于东盟可观的经济规模、人口红利以及持续的地区融合，因此具有巨大的数字化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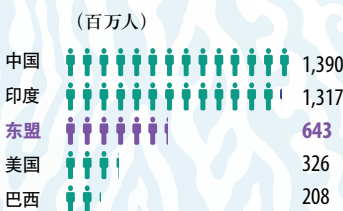
经济

如果将东盟看作一个单一经济体，那么从GDP角度看，它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人口

东盟的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三**。其中，**超过50%**的人口年龄低于30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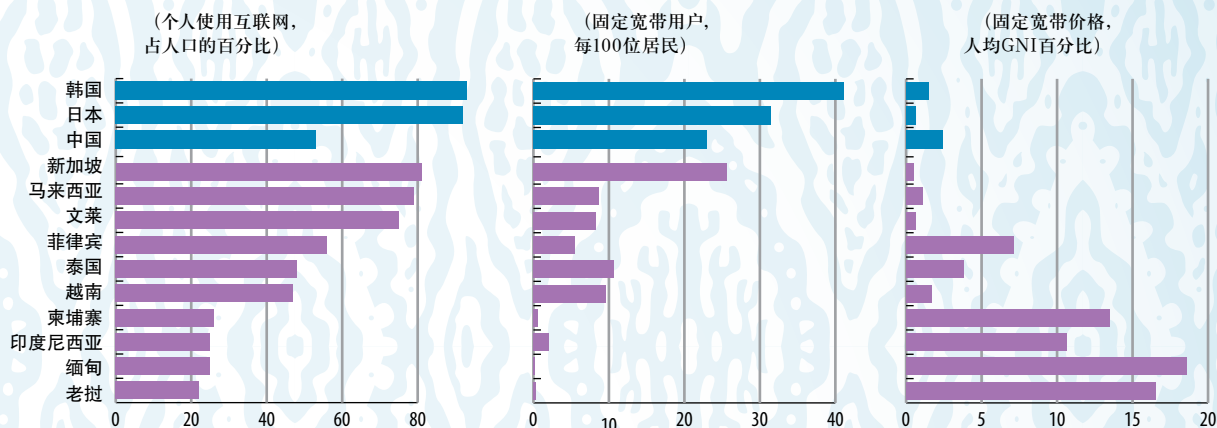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2018年4月）。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2018年4月）。

数字红利

东盟在互联网和宽带普及方面拥有巨大的数字红利。很多国家禁止高价固定宽带。



资料来源: 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Report 2017,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注: GNI=国民总收入。

东盟如何抓住机遇?



普遍的和可负担的互联网连接



鼓励竞争的商业环境



使工人的技能适应新需求的新的教育体系



能保护被自动化取代的群体的更强大的安全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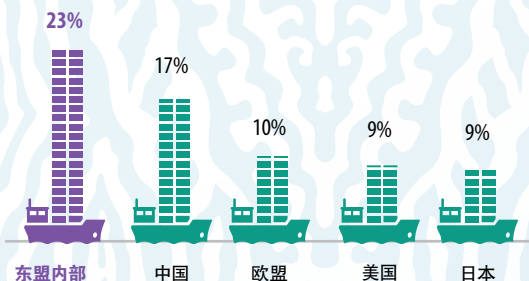


管理与金融科技相关的风险的金融监管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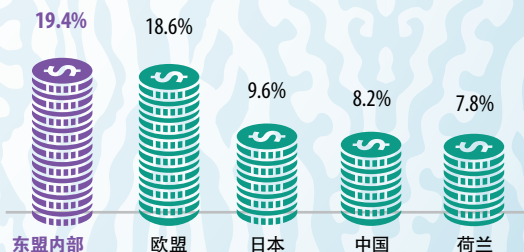
加速经济一体化

经济一体化为东盟数字经济的扩张和实现更大规模经济提供了平台

东盟最大的商品交易商, 按份额划分, 2017年



东盟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 按份额划分, 2017年



资料来源: ASEANstats。

数据倡导者

克里斯·威利兹采访拉兹·切迪，目前切迪正在利用大数据
重塑有关社会流动性的研究

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在踏入浴缸的时候突然灵感迸发。拉兹·切迪的灵感来袭则是在他淋浴的时候。

“我构想出了一种地图。当时我想到的是：如果能够以你生长的地方为基础绘制一幅地图来体现你向上流动的机遇，那将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切迪(Raj Chetty)在其办公室中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最后，呈现出来的彩色地图是基于4000万名儿童及其父母的收入记录。通过红色和黄色的阴影，地图反映出全国范围内在社会流动性方面存在的巨大的地理差异。如果你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长大，对于处于收入分布倒数五分之一群体的家长而言，你达到最高五分之一群体的机会仅为4.4%；但如果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机会则几乎高出三倍之多。

该地图形象地阐释了2014年一篇题为《机会之地在哪里？美国代际流动的地理学》(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的论文。这篇论文是一直以来引导有关不平等、机会和种族方面公共对话的一系列研究的起点。在其中一项研究中，切迪及其合著者表示，在童年时期迁入贫困程度较低的社区可显著提升其成年期的收入和大学就读率。在另外一项研究中，这两位解释了为什么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持续好几代。此外，在一项对美国梦提出质疑的广为引用的研究中，他们发现自从1940年以来，向上流动率出现了显著下降。

前沿

在一些情形下，切迪的工作针对的是意料之外的新方向。在其他情形下，他的工作验证了社会学家或儿童早期教育专家之前的一些研究。不管怎样，使其研究产生如此影响的原因是对海量数据集的创新应用，这使他置身于领域转型潮流的最前沿。

“大数据在应用微观经济学中一直是具有革命性的。”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且与切迪经常合作的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说，“拉兹·切迪一直是这一运动的先锋。”

对于切迪而言，大数据赋予了经济学类似自

然科学的确定性。经济学家们有望拿出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来弥合意识形态分歧，并据此对公共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地方政府层面尤为明显，因为在这一层面，党派之争没有那么激烈。

“他积极维护着其意识形态的中立立场。”曾与切迪合作过的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戴维·哥伦斯基(David Grusky)说道，“他希望让数据说话，并尊重数据给出的结论。”

哥伦斯基将切迪描述为一个不知疲倦的研究者。在他为得出某个结论而努力工作的时候，他会广泛地涉猎各种相关文献，不管属于何种学科，并对所有能够想到的假设进行测试。“他认为，只要读者提出哪怕一个他之前没有分析过的问题，这就是一次惨痛的失败。”

作为大数据的一名倡导者，切迪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校内外与读者进行谈话。他经常和媒体记者接触，使其文章能够在网上发表，同时还提供易于理解的概述，这有助于吸引《大西洋》、《经济学人》和《纽约时报》等出版物对其著作进行广泛报道。

“如果我们所做的工作对于世界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应该让世界了解我们。”切迪解释道。

传播与倡导

分析海量数据集不仅是一项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同时成本也不菲。所以，切迪与哈佛大学的纳撒尼尔·亨德伦(Nathaniel Hendren)和布朗大学的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合作，共同开启了“机会均等项目”。这是一个微型智库，该智库募集到补助资金并聘用了十几位大学毕业生作为研究助理。这些人被称为“博士前”(pre-docs)，他们在继续在伯克利和哈佛攻读博士课程之前会花费两年时间开展全职工作，在学校他们会传播切迪的理念。

萨拉·迈钱特(Sarah Merchant)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她毕业于耶鲁大学，参与过2018年一项有关种族对经济机会影响的研究，该研究所采用的税收记录几乎覆盖1989年至2015年期间的所有美国人口。该研究表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并且会持续多代，这完

“我很清楚我们的成长机遇和经历有多么大的差异，而这一切都纯粹取决于运气。”

全是由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而非女性）之间的工资和就业差距推动的。研究发现，对于某一类黑人男孩而言，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距要小很多，这类男孩成长的社区贫困率较低，白人种族偏见程度较轻，并且低收入黑人之中父亲在位率（rates of father presence）较高。

“一直以来，种族差距在美国对话中占了很大一部分。”迈钱特说道，他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对有关该主题的浩繁的社会学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我们过去从未有哪个说法有如此巨大的数据集验证。这确实令人感到振奋。”

表亲兄弟姐妹则没有如此幸运

切迪今年39岁，但看上去像个大男孩，态度认真热忱，让人无法与他所取得的那些成就联系起来——他曾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奖学金（也被称为“天才奖”），以及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是由美国经济学会每年为40岁以下且被视为对相关领域做出最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颁发的。

他对社会流动性的兴趣来源于他的出生国印度。在印度，有些家庭希望追求进步，但由于贫困，他们仅能负担一个孩子的大学教育。他的父母是幸运儿：他的父亲是一位获得了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而他的母亲是一位医生。拉兹·切迪就读于一所精英私立学校。而他的表兄弟姐妹们则没有如此幸运。

“我很清楚我们的成长机遇和经历有多么大的差异，而这一切都纯粹取决于运气。”切迪说道。

切迪一家在他9岁的时候离开印度来到美国，切迪被两国生活水平的鲜明对比所震撼。在17岁时，他作为学生代表在密尔沃基学校的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词。

尽管切迪起初对科学感兴趣——他的两个姐姐都是生物医学研究人员——但是他无法想象自己将要在实验室中度过一生，所以他选择了经济学。“我一直喜欢数学和统计学。”他说，“我想从事一项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工作。”他被哈佛学院录取，而且不同寻常的是，作为一个本科在读生，

他成为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的研究助理，后者也是一位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获得者。切迪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从大学毕业，并且又花了三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切迪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过一段教学经历，之后便返回哈佛大学，并在29岁时成为史上最年轻的经济学终身教授之一。他于2015年调至斯坦福大学。他和妻子桑达利，一位研究干细胞的生物学家，育有一个小女儿。

弗里德曼是切迪在哈佛的同学，目前与切迪共事。在他的记忆中，切迪是一位“把精力集中在重大问题上的人。”

不过，切迪对缺少用于实证研究（而非理论研究）的可得数据而感到沮丧。他认为，根据不同的假设和方法论，规模较小的数据集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解读。“这让人感觉有些不堪一击。”他说。

“我想通过图表的方式来完成工作。”他接下来说道。这样，“你就不会强行假设存在线性关系或二次关系。你只会说，‘我们将数据制成图形，看一下会得到什么结果’。”

为实现这一想法，切迪需要数据，大量的数据，不是数千个观测结果，而是数百万个。对于他的团队来说，无法从美国政府数据集获得如此巨大的数据，但是他找到了奥地利和丹麦的数据集，并撰写了一系列他认为比之前的研究结果更加有确凿证据的论文。之后，在2009年，美国国税局同意让他们获取清除了可识别个人信息的税务数据。

系统性差异

这是一条主线，由此产生了关于代际流动性地理分布的论文，这篇论文由切迪与亨德伦、赛斯和伯克利的帕特里克·克莱恩（Patrick Kline）共同撰写，文中明确体现了国家内部不同的向上流动率。接着，下一步是该寻找其原因是什么了。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居住在夏洛特与居住在圣荷西的人口类型存在系统性差异，比如在种族或收入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更加吸引人的假设



经济学家拉兹·切迪与其反映向上流动地理分布的地图。

是，圣荷西可能有某种可引起向上流动的独特之处，所以在童年时期移居至此可能会提高其成年之后的成功机会。

对此进行核实的方法是考察在孩子们从一个地方移居至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切迪和亨德伦无法针对现在的孩子开展随机化实验。事实上，他们构建了经济学家所称之为的“准实验”。通过正确的方式对数以百万计的纳税记录进行分类整理，他们找到那些曾在不同的年龄迁居于两个相同的地方之间的人，并对他们的成就进行比较。

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仔细查阅在1996年至2012年期间500万名其家庭在国内迁居的儿童的纳税记录。他们的调查结果是：儿童在更优越的环境中每多生活一年——对照已在此地生活的儿童的收入——意味着其长大之后的收入就更优渥一些。

“这些大数据集的巨大作用在于，当你掌握了足够的且具备创造性的数据，你基本上就可以找到实验的方式。”切迪表示。

将这些数据汇集起来是一项令人生畏的工作，而对数据进行分析则会带来更多的挑战。“我们还需要运用反事实分析来分离出因果关系。”亨德伦说，“将大数据整合起来，并精细地分解数据，最终发现令人信服的因果模式——这是拉兹·切

迪的一项突出优势。”

迁往机会之地

他们的结论是，有些地方闪耀着机会的火花，但这与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于20世纪90年代所开展的一项很有影响力的研究相左，这项研究名为“迁往机会之地”。

政府的这项研究针对五个大城市中生活在极度贫困公房之中的4600个家庭，这是一项大规模的随机化真人实验——这在社会科学中是罕见的。实验随机选取了1/3的家庭，他们接受住房补助并搬迁至贫困程度较低的区域；另外1/3的家庭也获得住房补助，可搬迁至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地方；余下的群体，即控制组，依然居住于原有的公房里。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在那些搬迁至贫困程度较低区域的家庭中，较大的孩子和成人的收入和就业情况没有得到改善。

切迪与亨德伦和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一起开展合作，再次进行研究，但是这次关注的人群为13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将相关数据与联邦税务数据联系起来，确认了之前进行的准实验所获得的结果。那些迁居至贫困程度较低区域的儿童长大之后，其收入比那些未搬迁的儿童高出31%。此外，他们进入大学就读和

生活在更好社区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成为单亲父母的可能性更低。

这一研究让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房屋管理局的负责人格雷格·鲁斯（Greg Russ）感到惊讶。他说：“这有些像开始时处于一间只有一点光线的黑屋子之中，然后有人打开了所有的灯。”

在那之前，像鲁斯这样的房屋管理者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为家庭提供住房补助用以搬迁至贫困程度较低的区域能改变其经济状况。大部分住房补助仅被用于从一个高度贫困的区域搬迁至另外一个类似这样的区域。

鲁斯来到切迪位于哈佛的办公室，他随身带着一份切迪的研究文章的复印件，上面有大量的红笔标注。他们的会面促进了“创造迁往机会之地”的创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住房联盟，该联盟为切迪及其同事提供数据，同时也通过他们的研究来测试住房补助项目模型。

广泛的吸引力

我们采用上述研究作为一个示例来说明切迪的政策建议如何对整个意识形态产生吸引力。长期而言，对纳税人来说，为其家庭提供住房补助，使之迁居至“机会之地”将产生积极的回报。他说，因为这些家庭中的孩子在长大之后的收入更高，他们的纳税额也随之提高。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桌子上摆着免费的午餐，你可以尝试去享用。”切迪表示，“我们联邦政府花费了大量资金用于建设经济型住房，每年达450亿美元。但是，这笔钱的使用并没有在帮助儿童获得良好成就方面尽可能地做到有效。”

切迪的团队在西雅图发现了那些被他称之为“机会便宜货”的社区——这些社区可为孩子们带来良好的成就，并且经济上也是低收入家庭所能够接受的。目前，他们正在继续努力，在全国范围之内寻找这样的区域。

鲁斯目前担任明尼阿波里斯市公共住房管理局的领导，对他而言，这意味着一个突破。“我们自1976年以来一直在发放住房补助，”他说，“但是，我们在发放这些补贴的时候从来没提供为他们一份地图说，‘嗨，你知道吗？如果你拿着这些住房补助搬迁至两英里之外的区域，你可能会打

破贫困的代际循环’。”

切迪强调机会平等，这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不同于一些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财富税等再分配政策，这些再分配政策旨在弥补产生的不平等结果。

“机会可以将人们团结起来。”他表示。尽管不平等是一项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也可能会引起不和，他补充道，“但总体而言，所有人都赞成让孩子们享有更平等的机会。”

加州案例

不过切迪并未回避争议。2014年他在由一群少数族裔学生提起的针对州政府的诉讼中以专家证人的身份作证，为学生们提供支持。在“贝尔加拉诉加利福尼亚”（Vergara v. California）一案中，学生表示，由于州政府增加了解聘不称职教师的难度，他们的教育受到了影响，而且少数族裔的学生更有可能被分配给那些水平差的教师。

切迪引用他与两位经济学家针对250万名纽约市学生所开展的一项研究，证明了解聘效能最低的教师能够极大地提高学生成年之后的收入。他赞同一种被称之为“附加值”的教师评估方法，该方法可衡量教师对学生考试分数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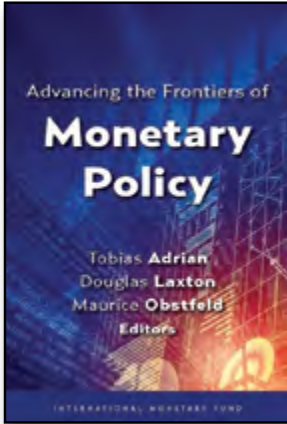
这种衡量标准引起了教师工会的强烈反对。教师工会认为，分数受到众多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比如家庭环境和内在能力。切迪表示，消除上述因素的影响是可以做到的。伯克利的经济学家杰西·罗斯坦（Jesse Rothstein）为政府出庭作证，他反驳了切迪的方法论。法官最终判决支持原告，但是该判决在上诉法院被撤销。尽管这种争论持续存在，但罗斯坦表示，“我认为这绝对是一场富有成效的讨论。”

近来，切迪一直在致力于研究如何为儿童增加机会。“我们知道环境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到底怎么做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呢？”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一问题，这将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FD}

克里斯·威利兹（Chris Wellisz）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



2018年秋季 IMF重点图书推荐



《推动货币政策前沿领域》

Tobias Adrian、Douglas Laxton
和 Maurice Obstfeld 编

30美元，英文，260页，平装
ISBN: 978-1-48432-594-0



《释放加勒比地区的增长潜力并增强其弹性》

Trevor Alleyne、Elie Canetti、Inci Otker、Uma Ramakrishnan 和 Krishna Srinivasa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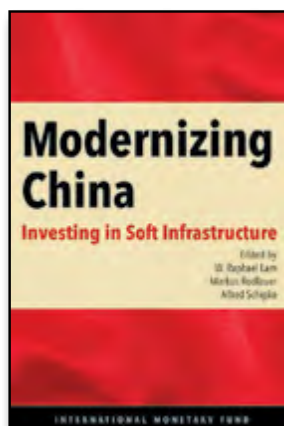
25美元，英文，378页，平装
ISBN: 978-1-48431-519-4



《争夺下一个收入领域》

Ali Mansoor、Salifou Issoufou
和 Daouda Sembene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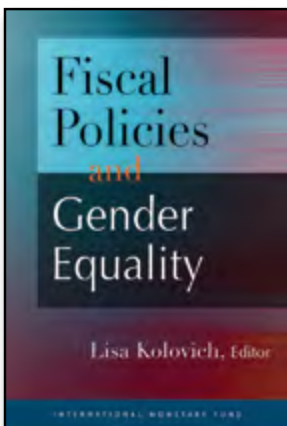
40美元，英文，418页，平装
ISBN: 978-14843-0313-9



《现代化中国》

W. Raphael Lam、Markus Rodlauer 和 Alfred Schipke 编

38美元，英文，392页，平装
ISBN: 978-1-51353-994-2



《财政政策与性别平等》

Lisa Kolovich 编

35美元，英文，250页，平装
ISBN: 978-15135-903-6



《中央银行面临的挑战》

Yan Carrière-Swallow、Hamid Faruquee、Luis Jácome 和 Krishna Srinivasan 编

30美元，英文，272页，平装
ISBN: 978-1-51359-176-6

更多信息，请浏览 Bookstore.imf.org/fd918a



贫穷与腐败的关联

劳拉·阿朗索谈反腐斗争为什么必须在多条战线上展开

大卫·佩德罗萨

2015年曾在众议院任职，并担任透明国际阿根廷分会常务董事的劳拉·阿朗索 (Laura Alonso)，被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任命为阿根廷反腐办公室主任。她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拥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硕士学位。此次接受《金融与发展》大卫·佩德罗萨的采访，阿朗索谈到了解决腐败问题为什么对脱贫至关重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各方面人员如何参与，以及如何利用科技提高透明度。

《金融与发展》(以下简称 F&D)：政府的哪些领域受腐败影响最为严重？

劳拉·阿朗索 (以下简称 LA)：在所谓“重大腐败”的层面，阿根廷历史上几个常见的腐败领域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采掘业和海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来降低风险，加强对采购和承包过程的管制并提高透明度——包括公职人员的行为和资产，并加强各个领域内部的审计制度。

F&D：您曾说过阿根廷政府把反腐斗争看作脱贫斗争的一部分。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LA：贫困人口是腐败的受害者，因为腐败会导致国家缺乏效率、管理不善、公共服务质量低下以及基础设施投入少，这将直接影响这部分人的生活质量。腐败的第一批受害者通常就是最贫困的民众。他们还被剥夺了新的工作机会，因为，我们都知道，腐败会阻碍优质的私人投资，这是很悲哀的。

F&D：私人部门应该如何参与进来呢？

LA：让私人部门参与到反腐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良好的商业惯例以及鼓励企业检举政府采购或合同谈判中的违规行为来实现。关于公私合作，反腐办公室启动了一个高级别的举报机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巴塞尔治理研究所为我们提供了技术指导。国家公路局在第一个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项目期间签署了 8 份合同，在这过程中没有收到腐败举报，这表示流程设计和诚信条款的加入——以及这个高级别举报机制——有利于在参与投标的众多投资者之间建立信任，包括第一次在阿根廷参与投标的境外投资者。

F&D：政府是如何利用技术手段进行反腐的？

LA：在阿根廷，行政部门在技术方面曾经很落后。

但是自现代化部成立以来，在行政管理现代化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电子文件的使用使得大多数内部行政程序实现了电子化管理，各个程序更加透明，更加便于监督。远程程序的使用加速了清关过程，使其得到更好的监督。马克里总统签署了一份法令，发起了电子文件改革，同时广泛地实施了开放数据和开放政府的重要政策。为实现国家数据库的互操作性，我们一直在非常努力。以反腐办公室为例，数据库的互操作性再加上电子文件的使用，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实施管控，全面掌握行政管理关键流程的各个领域，并形成统计资料和交叉检验数据。

F&D: 这听起来像是多管齐下的措施。

LA: 总统希望能够全面发力，包括管理、操作、执行、立法，以保证大大小小的改革的持续性，这些改革显著地改善了行政程序。而且这些改革不是渐进式的，有许多变革是令人震惊的，比如电子文件的使用，包括对成千上万名行政公职人员的培训，他们以前都是用纸质文件办公的。在全国现代化委员会的努力下，省级行政机构也实现了电子化办公。司法机关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后也实现了这一做法。我们刚到反腐办公室的时候，不能进入任何国家数据库，但现在我们可以进入超过 15 个数据库。到我们任期的最后一年，会实现大量数据库交叉检验，届时我们可以查看到公职人员的财务状况、资产、文化和社会背景。

F&D: 为使公众能看到这些数据，政府做了哪些工作？

LA: 所有的数据库都可以在 www.datos.gob.ar 网站上找到。45000 名行政部门的公务员向反腐办公室申报了他们的资产和财务状况，我们可以在此网站找到关于他们的书面陈述的数据目录。我们是唯一一个大量公开发布该信息的国家，并且每年都会进行更新。网站还有关于阿根廷采矿、天

然气和石油开采，人口和教育方面的数据，以及有关公共健康和经济的数据。阿根廷的预算透明度在过去几年有所退步，但现在已经得到了恢复和提高。同时，阿根廷恢复了公共统计系统的质量，在向国际机构报告时可提供大量数据。

F&D: 下一个里程碑会是什么呢？

LA: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筹备一个未来五年的全国反腐计划，这不仅是反腐办公室的责任，也会涉及全部的行政领域和部门，以便每个部门根据能力范围协调特定的部门政策，包括关键的权力下放机构，如社会保障总署、税务和海关机构，或者诸如管理食品和药品质量的机构。

F&D: 您是如何衡量成功的？

LA: 没有哪个国家能从名为腐败的疾病中痊愈，因为那些透明度和内控水平高的国家通常把不良行为转嫁到了国外。因此，我认为多边工作是反腐的关键。阿根廷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共廉政官员组织和 G20 反腐小组。虽然没有国家可以完全避免腐败，但是国家之间的差别在于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措施来治疗这个“疾病”。我认为成功是可以衡量的。以阿根廷为例，大大小小的改革在持续进行并保持稳定，不仅在联邦或者政府行政层面实施，还涉及司法部门和各省、市。如果这些改革事项能在未来 10 年中得到坚持贯彻，那么这一阶段就是成功的。 **FD**

大卫·佩德罗萨 (David Pedroza) 是 IMF 信息交流部的信息交流官员。

由于篇幅所限且为了表达得更清晰，本文对采访稿进行了编辑。

是否存在 侨汇陷阱？

高侨汇水平可能会引发经济停滞及依赖的恶性循环

拉尔夫·沙米、埃克哈德·恩斯特、康奈尔·弗伦坎普、安妮·欧金

由于可能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工作者向其国内家庭汇入的资金，也就是侨汇，引起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2017年，侨汇金额超过4000亿美元，其规模介于官方发展援助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如此庞大的资金流对于接收这些资金的经济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当许多国家所接收的资金流入比该国的出口规模甚至经济规模都要大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侨汇有助于经济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侨汇是由家庭关系驱动的个人对个人的资金转移，这些来自国外的资金将有助于家中亲属支付其生活所需。其次，侨汇也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通过投资于人力资本或物质资本或者为新业务提供资金的方式。

经济学家们一直致力于衡量这两种效应。很多研究证实，侨汇对于对抗贫困而言至关重要，它使数百万家庭从贫困或无力生存中摆脱出来。但与此同时，经济研究未能发现侨汇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见图1）。

后者的结果令人费解，特别是在已发现侨汇收入可以促进更多家庭消费的情况下。消费支出是短期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而为了满足新增需求而进行产业扩张时，最终也将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但越来越多的对侨汇与增长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表明，侨汇会以减少增长和增加对国外资金依赖度的方式改变经济。换句话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侨汇陷阱导致经济陷入更低增长、更多人移民的循环之中。

引擎、减震器还是制动器？

以黎巴嫩为例。多年来，无论是从绝对数还是从相对数来看，这个国家一直是侨汇的主要接收国之一。在过去十年中，每年平均流入超过 60 亿美元资金，相当于 GDP 的 16%。根据 IMF 的数据，2016 年黎巴嫩人均收到 1500 美元，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考虑到这些流入资金的规模，侨汇在黎巴嫩经济中起着关键（即便不是主导）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侨汇成为该国社会保障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均占家庭收入的 40% 以上。毫无疑问，对于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内战、入侵和难民危机的国家来说，侨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稳定作用。此外，侨汇也是外汇的一个宝贵来源，比该国商品出口多出 50%。这帮助黎巴嫩在政府债务高企的情况下也能维持汇率稳定。

虽然侨汇有助于黎巴嫩经济对抗冲击，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已经成为增长引擎。1995 年至 2015 年间，黎巴嫩的实际人均 GDP 年均增长仅为 0.32%。即使在 2005—2015 年期间，其年均增长率也仅为 0.79%。

黎巴嫩不是个例。在侨汇流入与 GDP 之比最大的 10 个国家中——如洪都拉斯、牙买加、吉尔吉斯共和国、尼泊尔和汤加——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增长率高于同地区内的其他国家。而且大多数这些国家的增长率远低于其他国家。认识到这些国家每一个都面临着其他可能会影响增长的问题，这一点固然重要。但是，侨汇似乎是增长缓慢的另一项决定因素，而非其结果。侨汇甚至可能会放大制约增长与发展的其他一些问题。

寒蝉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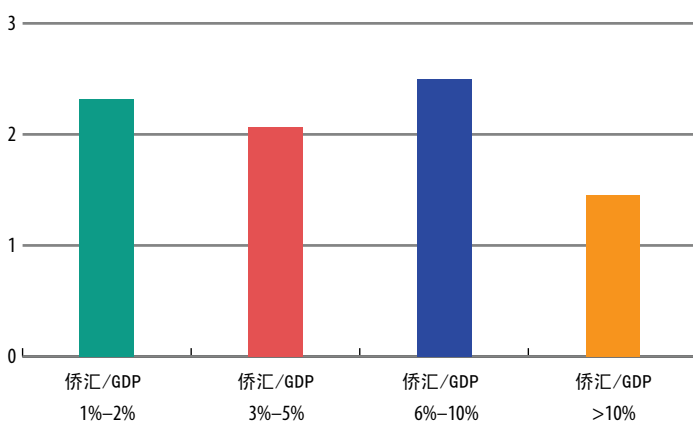
回到黎巴嫩的例子，该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可能被寄予厚望，以期能带来强劲的增长。黎巴嫩的家庭，包括那些接收侨汇的家庭，将大部

图1

无明显联系

没有证据表明侨汇会显著增加一国的经济增长。

(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百分比,按接收侨汇的水平划分)



资料来源: IMF,《国际收支统计》; IMF,《世界经济展望》; 以及作者的计算。
注:本图显示了1990—2017年间接收各种侨汇的国家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

分收入用于年轻人的教育，他们在标准化数学测验中的得分远高于该地区的同龄人。同时，中东地区排名前 20 位的大学中有三所大学位于黎巴嫩，这些大学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比其在该地区的同行的更多。黎巴嫩充裕的侨汇流入可以为其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所建立的创业公司提供种子资金。

但统计数据显示，黎巴嫩的创业活动远远少于其应有的数量，特别是在高科技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该领域的规模不到 GDP 的 1%，而且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黎巴嫩在该领域的发展得分非常低。针对黎巴嫩接收侨汇的家庭的总体消费习惯的研究表明，只有不到 2% 的汇款流入用于创业。相反，这些流入的资金通常被用于诸如餐馆用餐等非贸易商品和服务，以及进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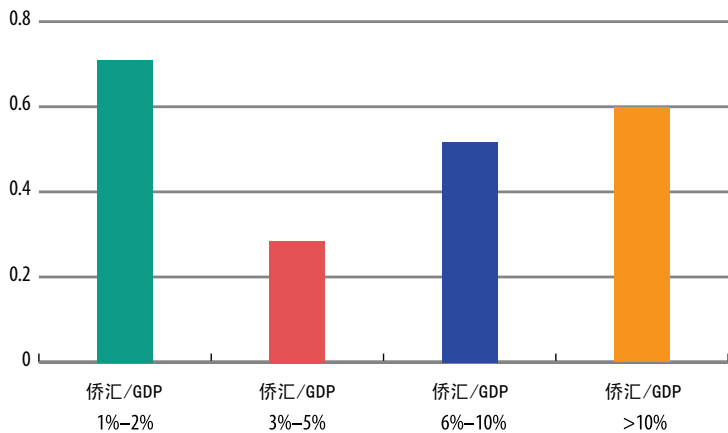
许多年轻的黎巴嫩人选择移民，而非创业，或是在已有的企业工作。统计数据非常明显：多达 2/3 的男性和近一半的女性大学毕业生离开这个国家。雇主抱怨移民出境人才流失导致缺乏高技能工人。这种短缺被认为是除旅游业、建筑业

图2

患上荷兰病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侨汇导致汇率升值，使该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

(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百分比，按接收侨汇的水平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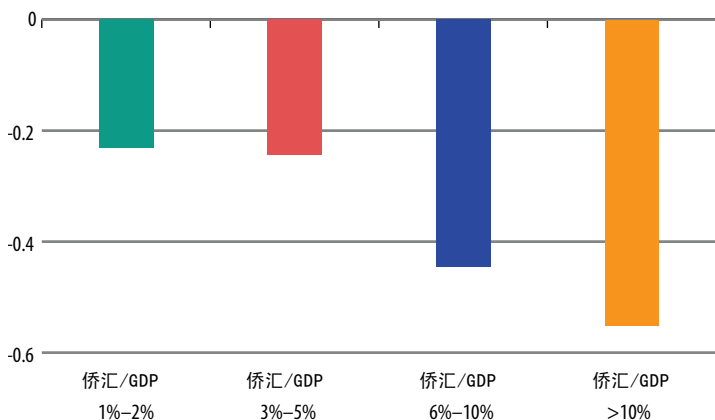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国际收支统计》；IMF，《国际金融统计》；以及作者的计算。
注：本图显示了1990—2017年间接收各种侨汇的国家的实际有效汇率。

图3

对政府效率的影响

经济体对于侨汇的依赖已被证明会降低政府对其公民需求的反应度。

(范围在-2.5 (差) 和2.5 (好) 之间，2000—2016年平均值，按接收侨汇的水平划分)



资料来源：IMF，《国际收支统计》；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以及作者的计算。

和房地产业等传统的增长来源以外，黎巴嫩实现经济多样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对于那些选择在其他地方谋求出路的年轻人而言，他们认为国内缺乏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

因此，侨汇陷阱的出现似乎部分是因为这一收入来源为年轻人做好移民准备，而不是投资于本国企业。换句话说，接收汇款的国家可能会依赖于出口劳工，而不是依靠此劳动力所生产的商品。在一些国家，政府甚至鼓励发展机构专门为出口生产熟练的劳动力。

但为什么这种情况得以发展且持续下去呢？

从家庭层面和经济层面研究侨汇对其接收人的影响，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解答。我们已经对收到大量侨汇的个别国家——如埃及、墨西哥和巴基斯坦——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且对接收各种汇款的各个国家（和那些汇出而非接收侨汇的国家）进行了国别比较分析。来自学术文献中的见解可以合并为一个一致的解释，说明如何以及为什么收到大量侨汇流入的经济体可能会陷入低增长。

首先，侨汇主要用于家庭消费，并且经济中对于所有产品（非贸易产品和贸易产品）的需求也随侨汇的增长而增加。这给价格带来了上行压力。外汇的大量涌入，加上价格上涨，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导致产量下降。有些人把这种综合征称为荷兰病（见图2）。

恶性循环

侨汇对工作激励的影响使这个问题变得更糟，因为它增加了所谓的保留工资——即工人愿意接受某种特定工作的最低工资。随着侨汇的增加，工人从劳动力大军中退出，而由此产生的工资上涨给物价带来了更大的上行压力，进一步降低了出口的竞争力。

然后，资源从生产遭遇国际竞争的贸易品行业流向服务于国内市场的行业。其结果是：高薪、高技能工作岗位数量下降，这在贸易行业很常见；非贸易行业中低技能、低薪工作岗位增加。

劳动力市场的这种转变鼓励高技能工人移民出境，寻找薪水更高的工作。与此同时，大多数家庭的生活成本随国内物价的上升而上涨，而竞

争力的下降意味着更多的产品必须依赖进口，从而损害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家庭成员移民的动力，这样他们就可以将钱汇回国内，帮助亲人承担更高的生活费用负担。

更糟糕的是，侨汇往往用于支付房产，从而导致房价上涨，并在某些情况下引发房地产泡沫。这也为希望赚取购买房屋的足够资金的年轻人提供了移民的动机。这一切的结果是：移民、经济停滞、生活成本上升以及更多移民的恶性循环。

缺乏改变的动机

政府有可能通过采取措施保持本国产业竞争力，以减缓或者打破这种循环。但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如改善教育体系和基础设施，价格昂贵且需要数年才能实施。此外，还需要有强大的政治意愿，才能取得成功。

然而，研究表明侨汇具有严重的政治经济副作用（见图3）。特别是，大量资金流入使政府对社会需求的反应度降低。理由很简单：接受侨汇的家庭可以更好地避免经济冲击，并且要求其政府改变的意愿更低；反过来，政府对其公民负责的义务感也降低了。

许多政治家对因侨汇流入而减少的公众监督和政治压力而感到高兴。但政治家还有其他理由来鼓励侨汇流入。从政府对消费征税方面来说，如增值税，侨汇扩大了税基。这使得政府能够继续在获得民众支持的事项上进行支出，从而帮助政治家赢得连任。

考虑到这些好处，许多政府积极鼓励其公民移民并汇款回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设立官方办公室或机构来促进移民，便则不足为奇了。侨汇让政治家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通过改善个别家庭的经济状况，使他们不太可能向政府进行投诉或审查其活动。对于移民和侨汇的官方鼓励也使得侨汇陷阱更加难以逃脱。

侨汇与经济增长率增加之间的关联缺乏明确证据——缺失经历由侨汇带动增长的国家的例

子——表明侨汇确实干扰了经济增长。此外，黎巴嫩的情况提供了侨汇陷阱是如何运作的具体例子。

如果侨汇陷阱确实存在，那么该怎么办？

显然，鉴于对数百万家庭福祉的重要性，侨汇不应该受到劝阻。难道侨汇陷阱只是社会为了降低贫困而必须换取的成本吗？未必。

鉴于对数百万家庭福祉的重要性，
侨汇不应该受到劝阻。

防止侨汇的两个缺点——荷兰病和削弱治理——可以有助于各国避免或逃离侨汇陷阱。提升面临国外竞争的行业的竞争力是缓解荷兰病的一般处方。具体措施包括：升级国家的基础设施、改善教育系统和降低经营成本。政府还可以在刺激新业务形成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包括为初创企业提供种子基金或其他财政援助。与此同时，侨汇接收国也必须推动更强的制度和更好的治理。

提高经济竞争力以及加强治理和社会体制早已被认为对包容性增长议程是至关重要的。但侨汇陷阱加剧了实现这些目标的紧迫性。通过消除以前未认识到的阻碍包容性发展的障碍来避免这种潜在的严重的侨汇陷阱，实际上可能是释放其发展潜力的关键。**FD**

拉尔夫·恰米（RALPH CHAMI）是IMF能力发展学院副院长；埃克哈德·恩斯特（EKKEHARD ERNST）是国际劳工组织宏观经济政策及就业小组组长。康奈尔·富伦坎普（CONNEL FULLENKAMP）是杜克大学实践经济学教授。安妮·欧金（ANNE OEKING）是IMF亚太部经济学家。



尼日利亚拉各斯市中心的一处市场。

非洲 携手共进

撒哈拉以南非洲日趋融合——这将有助于增长，但并非没有风险

弗朗西斯科·阿瑞萨拉、马修·贝隆、
马尔戈·麦克唐纳

有关贸易方面的国际对话目前受来自贸易战的威胁所主导，但非洲大陆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经过两年的谈判，非洲大部分国家的代表于2018年3月21日在基加利举行的非洲联盟特别峰会上签署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是解决极端且停滞的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尝试，还是快速且稳定的区域一体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过分析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之间一系列日益密切的联系，并引用IMF双边贸易统计数据，我们最近的研究工作表明答案属于后者。我们的

照片：ISTOCK/PEETERY

研究表明现在的次大陆比过去更加融合。一些人可能会对此感到意外，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融合程度实际上已与世界其他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水平相当（见图1）。

虽然各国之间经济关系更为紧密是发展的一个可喜信号，也是未来增长的良好推动力，但它们也带来了挑战。更广泛的互联互通可能会使各国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包括好的和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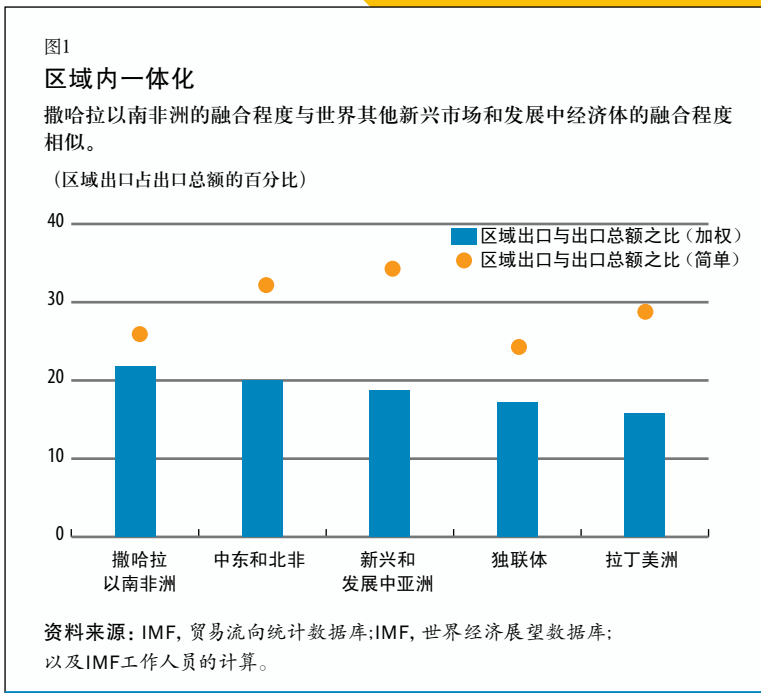
从积极一面来看，各国之间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会促进增长外溢，当高速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将其他经济体集聚到一起时。从消极一面来看，更为广泛的互联互通可能会使小型经济体受到其合作伙伴经济衰退的影响。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近20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活动活跃，但在2015年经历了一体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以及尼日利亚和南非这两个该地区最大经济体的经济活动放缓，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增长减速至20多年以来的最低点。

但是情况发生了改变，受益于更有利的外部环境，经济增长自2017年以来开始恢复。尽管如此，经济复苏的情况好坏参半，目前尚不清楚较大经济体的低迷复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国家。在当前经济复苏的情况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可以利用区域联系的好处，同时尽量降低风险。

更广泛的互联互通可能会使各国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包括好的和坏的。

贸易的角色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一体化最为显著的体现是贸易，其密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出口占出口总额的份额翻了三倍多（见图2）。撒哈拉以南非洲目前在全世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区域贸易一体化比例最高，其次是中东和北非，以及新兴和



发展中亚洲。

近几十年来，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关税被削减、制度和政策得到强化，带来了更为深入的一体化。虽然这一趋势令人欣喜，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区域内贸易水平仍然相对较低，商业环境持续面临挑战。

增长推动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不断融合，但融合本身也转化为重要的增长外溢。我们的研究发现，平均来说，对一个典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而言，区域内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加权增长率每增加5个百分点，该国的经济增长率将增加

0.5%。有趣的是，该地区贸易途径外溢效应似乎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相似，并且区域内贸易的相对份额也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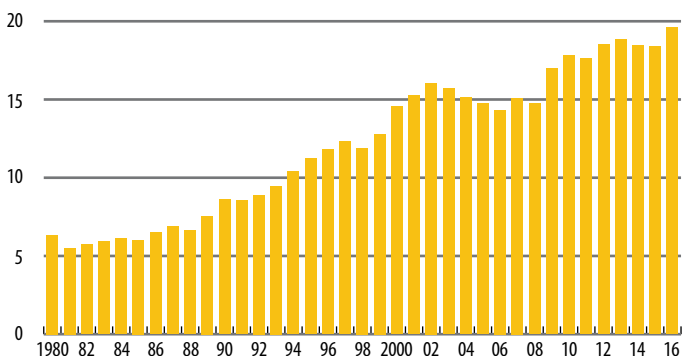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当谈到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体化的乐观形势时，仍有一些警告——其中大部分警告表明，非洲大陆要达到完全融合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图2

蒸蒸日上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区域出口占出口总额的份额在近几年间翻了三倍多。

(区域贸易占贸易总额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IMF, 贸易方向统计数据库; IMF,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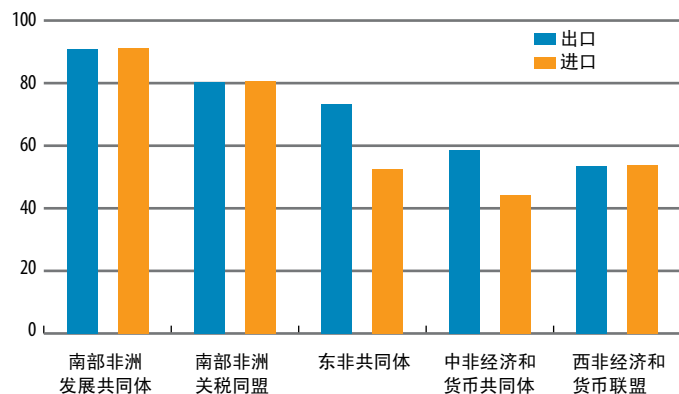
注: 计算是基于每年的加权平均值。

图3

次区域贸易

货币区域集团和其他区域组合之间的贸易占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的最大份额。

(次区域出口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IMF, 贸易流向统计数据库; 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今天, 大部分区域内贸易高度集中。10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占区域内出口总需求的 65%, 作为大部分区域内贸易的目的地市场, 它们有可能产生最大的区域外溢效应。其中包括南非及其邻国科特迪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大型经济体, 但意外地排除了其他国家, 如安哥拉和尼日利亚, 这些国家主要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

整个非洲大陆还存在着其他一小群密集的区域

域内一体化, 尽管其进口份额与大国的进口份额相比较小, 而且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区域内的出口总量相比也较小。区域内一体化密集的国家往往规模较小, 而且进口额占其邻国 GDP 的重要份额, 因此成为次区域层面重要的外溢来源。对于布基纳法索、加纳和马里等西非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这些国家是部分贸易伙伴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市场, 出口价值超过 GDP 的 1% 以上。

仔细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贸易的地理分布就会发现明显的次区域集中现象。仅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SACU) 内的贸易就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区域内贸易总额的一半。此外, 对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东非共同体 (EAC) 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SACU) 来说, 这些地区内的贸易占其成员国区域内贸易的 70% 以上。在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 (CEMAC) 以及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 (WAEMU) 地区, 地区内贸易占其区域内贸易的约 50% (见图 3)。从绝对数来看,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分别占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总额的 70% 和 50% (见图 4)。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邻国之间贸易盛行的原因可以解释为: 双边贸易受距离和社会文化差异的阻碍, 即距离越远, 贸易变得越困难。事实上, 虽然这是一个全球现象, 但这些障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比在世界其他地方更为普遍。因此, 邻国之间的贸易增长毫无悬念成为该地区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980—2016 年区域贸易增长的大约一半来自这种贸易一体化——这一结果在东非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尤为突出。

整体的一体化模式不仅反映了地理相邻性, 而且反映了在次区域内基础设施的制约以及区域贸易协定和更低的非关税壁垒的影响。鉴于该地区不够发达, 次区域之间的贸易最有可能进一步融合。就这一点而言, 由非洲大陆各国签署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掀起一波更深层次融合的新浪潮。

撒哈拉以南非洲区域内一体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自然资源禀赋。事实证明, 一个国家可耗尽的自然资源在经济中的权重会严重影响其贸

易模式。

非资源密集型国家受地区需求的严重影响：区域内出口平均占 GDP 的 7%，或者占出口总额的 30%。非石油资源密集型国家呈现出类似的规律，但程度略低。

另一方面，石油出口国则不同，而且差别很大——石油生产国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额平均占 GDP 的 25%，而面向区域内出口仅占 1.5%。因此，这些国家免受区域外溢效应的影响，但却更容易受到全球外溢效应的影响。

复杂因素在起作用

贸易一体化不是凭空发展而来的。类似于支持和加强区域内贸易的驱动因素同时也加强了区域内的金融联系。2007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和美国的银行相继离开该地区，之后那些总部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银行就一直在加强其地区金融联系。持续的金融和技术发展也意味着整个地区的汇款成本更低，使得该地区的汇款量增加。在一些国家，这占据其 GDP 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份额。

财政政策决策可能对自由贸易国家或边境松散国家的价格和投资产生跨境影响。这些额外的外溢渠道正在加深，就像贸易一样，但它们目前主要是在次区域层面发挥作用。

从中期来看，不同行业更为广泛的融合意味着企业、金融机构和出口商可建立更大的市场去维护跨境客户关系。这也意味着金融机构有更多的机会为在经济上得不到充分服务的和被排除在外的人提供服务，并为海外劳工向家中亲属汇款提供服务。

撒哈拉以南非洲仍然是一片潜力巨大的大陆。考虑到其大部分融合到目前为止都停留在次区域，因此仍然有很大潜力实现更为深层次的融合。近期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如果得到有力实施，那么将进一步加速这一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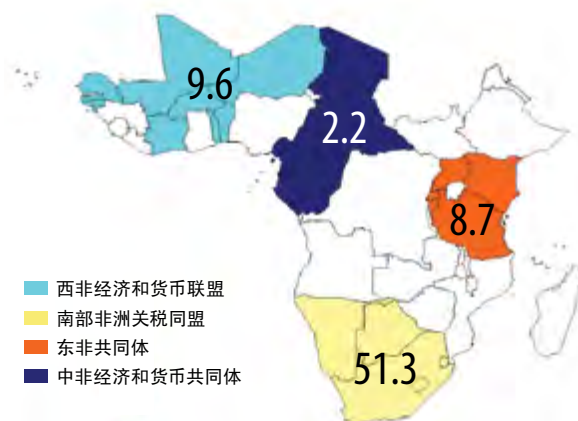
然而，经济冲击的预期应该促使政策制定者加倍努力解决外溢风险。需要采用结构性改革战

图4

邻国之间的贸易

距离以及文化和语言上的相似性解释了非洲区域内贸易盛行的原因。

(区域出口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贸易流向统计数据库；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掀起一波更深层次融合的新浪潮。

略来促进多元化，并防止由于过度依赖少量产品和合作伙伴而引发的外溢效应。通过《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所推动的更深入的贸易网络是一个可喜的发展，因为有助于各国与更多元化的合作伙伴交换更多的产品。各国政府应建立预防性缓冲措施，并监督和管理跨境联系——例如，在银行业和金融行业——以便为增长和稳定奠定基础。 FD

弗朗西斯科·阿瑞萨拉 (FRANCISCO ARIZALA) 是IMF非洲部的经济学家，马修·贝隆 (MATTHIEU BELLON) 是IMF财政事务部的经济学家，马尔戈·麦克唐纳 (MARGAUX MACDONALD) 是IMF研究部的经济学家。

本文基于由Francisco Arizala、Matthieu Bellon、Margaux MacDonald、Montfort Mlachila和Mustafa Yenice撰写的IMF外溢效应文件 (Spillover Note) “Regional Spillovers in Sub-Saharan Africa—Exploring Different Channels”。

知识如何传播

知识更迅速地扩散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好处

约翰内斯·尤格斯特、胡琪昂、弗洛朗斯·若默特、罗伯特·皮亚扎

2014年，一家中国公司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用3D打印机建造了一个拥有10户家庭的村庄。去年，一段太阳能高速公路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并将其直接传输到位于中国东部的济南市开通的电网。几年前，韩国开辟了一条道路，可以通过无线方式为在该道路上行驶的在线电动汽车充电。这些只是韩国和——更为近期的——中国近几十年来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进步的几个例子。

直到最近，全球知识和技术库的产生都一直集中在少数大型工业化经济体。从1995年到2014年，全球3/4的专利创新源自于五国集团(G5)技术领导者，即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知识更快地传播到更远的地方的潜力显著增加，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向其他技术先进国家学习并建设自身创新能力创造了更多机会。

在以 Giovanni Peri (2005) 的工作为基础的研究中，我们调查了过去 20 年间技术扩散的强度及其演变历程，以及这些发展对创新领域的影响。准确理解这种技术扩散如何发生至关重要：技术转让是传播知识及提升世界各地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关键。

新兴创新者不断涌现

当创新者提交专利申请以保护其知识产权时，他们必须明确其创新所依据的相关先前知识，例如来自其他创新者的专利。因此，跨专利引用的数量是直接衡量知识流的一项标准。我们的研究调查了从全球专利数据库 PATSTAT 获得的引用数量，该数据库涵盖超过 1 亿份专利文献。这一做法并非没有缺点，而且也没有涵盖所有知识流——例如，它排除了难以衡量的非正式知识流和专利侵权。然而，这是衡量各国技术知识传播的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它是可衡量的，并且可以被系统地记录下来（见图 1）。

在 1995 年，美国、欧洲和日本主导了全球专利引用。但在最近几年，以专利引用来衡量，韩国和中国对全球知识库的使用日益增加。

一项针对这些跨专利引用的更为正式的分析——以评估知识扩散的强度——也表明，知识从五国集团技术领导者扩散到新兴市场经济体（不仅仅是中国和原来的韩国）的比例在过去 20 年间有所增加。相比之下，从五国集团传播到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知识比例大致持平——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甚至有所下降。

新兴市场经济体可以利用更多全球知识的机会来提升其创新能力和生产力。来自五国集团的知识流入可以显著推动国内创新（以专利衡量），以及提高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生产力。例如，在国内研究与开发的数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从五国集团流入的知识每增加 1%，接收国家行业的专利活动平均将增加约 1/3。这种影响的力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特别是对于新兴市

场经济体而言。

研发的角色

这种赶超的结果导致新的全球创新者出现。虽然我们的研究结果广泛适用于新兴市场经济体，但韩国——1997 年成为发达经济体——以及中国脱颖而出，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是大经济体。两者都被列为前五大创新国家，无论是从专利活动指标还是研发支出来衡量（见图 2）。这种成功部分地反映了通过知识和技术转让进行学习，但也有可能是通过大量投入国内研发，甚至更广泛而言是通过教育提高人们理解和应用技术的能力来获得的。

国内研发具有双重目的——它可以促进新技术的发展，也可以帮助各国吸收现有的国外技术。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以上这些数据的主要来源——中国自 21 世纪初以来将研发支出增加了 9 倍，达到 3750 亿美元/年（按定值和购买力平价调整）。现在其研发支出仅次于美国（4600 亿美元），远超日本（1500 亿美元）。韩国每年支出 700 亿美元，接近法国、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大国的平均水平。

韩国和中国崛起的另一个衡量标准是专利活动数量的增长。对国际专利家族的研究——使用专利数量作为衡量方式，仅包含向至少两个不同专利局提交的申请以排除低价值专利——表明中国和韩国每年有约 20000 件发明专利。虽然这仍远低于日本和美国的专利数量（两国分别有约 60000 件），但中国和韩国的专利活动数量与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平均数量相当。按照经济部门对专利类型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后我们发现，中国在电气和光学设备领域以及韩国在电气、光学设备领域和机械设备领域的专利增加数量尤为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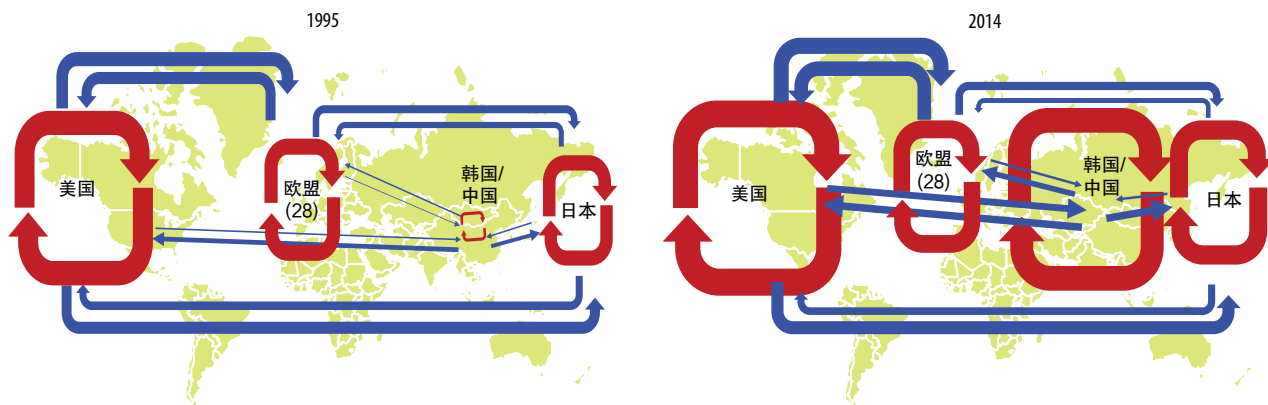
竞争：是好还是坏？

韩国和近年来的中国作为全球创新者的出现

图1

20 年来的不同

1995年，大多数专利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如今，中国和韩国已成为全球创新者。



资料来源：欧洲专利局，PATSTAT数据库；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图中显示了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蓝色）和之内（红色）专利引用流向的演变。在某一定的年份，箭头的粗细程度与相应的引用次数成比例。为了能清晰显示，引用数量随时间推移的增长无法按比例显示（图中2014年相对于1995年的大致比例是1.5；而实际比例是2.5）。欧盟(28)=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德国、丹麦、西班牙、爱沙尼亚、芬兰、法国、英国、希腊、克罗地亚、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立陶宛、卢森堡、拉脱维亚、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图中的数据标识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国家代码。

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发展，有望提升全球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但这些发展是否会阻碍传统技术领导者的创新，是否会导致全球生产率下降？我们的研究没有直接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并不认为情况是这样的。理由如下。

首先，技术领导者直接或间接从输出他们的技术和知识中受益。他们通过向其他国家出售技术（无论是体现在机器上还是通过专利许可）来直接受益。当然，这是在假设知识产权得到尊重，以便收购方可为该技术支持合理价格的情况下。但技术领导者也可以间接受益：其他经济体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更高的收入，这更加普遍地促进了对出口的需求，包括来自传统技术领导者的出口需求。

其次，更为巧妙的是，与大多数商品不同，知识是一种“非竞争性”的商品。一个人知道某些事情并使用该信息的事实并不妨碍其他人了解和改进它。从过去的研究工作中获得的知识——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外国的——都有望提高未来研究工作的生产力（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随着中国和韩国的创新者开发新思想并增加全球知识储备，传统技术领导者（当然，更普遍地说，全世界的）创新者也可以从这些新知识中受益。

跨专利引用数据表明，这种知识的滚雪球效应可能已经发生：例如，五国集团成员国的创

新者越来越多地引用中国专利。如今，这类引用在数量级上已接近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引用五国集团专利的情况。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知识流动不是单向的，仅从技术领导者流向其他国家。传统技术领导者从彼此的创新中获益，并获得比其他（非领导者）国家更大的利益（Chen and Dauchy, 2018）。

再次，在全球市场上，来自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日益增长的竞争力已成为创新和技术扩散的推动力。尽管竞争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但我们的分析表明，对于大多数国家和行业而言，竞争的加剧——无论是从中国的进口渗透度还是从与新兴市场企业崛起相关的全球销售集中度下降来衡量——激发了创新及对国外技术的采用。这一证据基于五国集团以外的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验，但它仍然表明竞争一直是促进创新的积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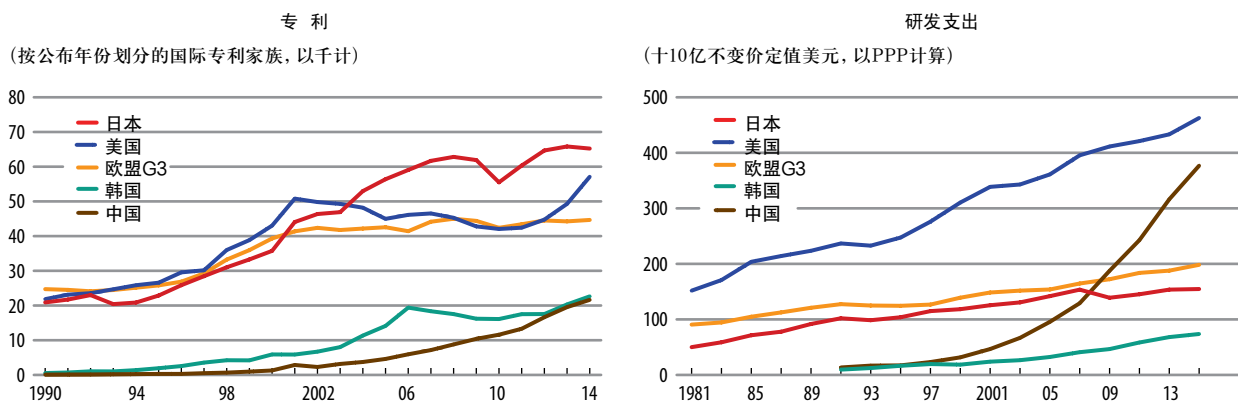
公平的竞争环境

从美国的创新趋势来看，总体研发支出持续强劲增长。然而，专利活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显示出趋于平稳的迹象。但这种生产率增长的下降更可能反映了处于两个主要创新浪潮——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以及备受期待的

图2

加入俱乐部

韩国和中国已经加入前五大创新国家之列，无论是通过专利活动指标还是研发支出来衡量。



资料来源：欧洲专利局，PATSTAT数据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欧盟G3=法国、德国、英国；PPP=购买力平价。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革命——之间过渡期的创新暂时放缓 (Brynjolfsson, Rock and Syverson, 2017)。其他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也可能有所贡献 (Adler and others, 2017)。

总而言之，技术扩散和新的全球创新者的出现可能不会损害传统的创新国家；竞争一直是创造力和创新的关键驱动力。但适当且公平的竞争环境至关重要：知识产权必须得以很好地设计和执行。多数五国集团国家的担忧——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担忧——都围绕着非市场、非优惠条款的强制技术转移，以此换取进入世界上最大的和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

最终，尊重知识产权最有利于创新和技术扩散。没有它，当创新者无法收回成本时，技术突破可能会受阻。知识产权保护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同样重要，如果它们想要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以及本地创新者的创造性中获益的话。中国专利的爆炸式增长或许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即随着国家发展有价值的自主创新，它将开始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FD

约翰内斯·尤格斯特 (Johannes Eugster)、胡琪昂 (Giang Ho) 和罗伯特·皮亚扎 (Roberto Piazza) 是IMF研究部的经济学家，弗洛朗斯·若默特 (Florence Jaumotte) 是该部的副处长。

本文基于2018年4月IMF《世界经济展望》第4章“Is Productivity Growth Shared in a Globalized Economy?”。

参考文献：

- Adler, G., R. Duval, D. Furceri, S. Kilic Celik, K. Koloskova, and M. Poplawski-Ribeiro. 2017. "Gone with the Headwinds: Global Productivity."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7/0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Brynjolfsson, E., D. Rock, and C. Syverson. 2017.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Modern Productivity Paradox: A Clash of Expectations and Statistics." In *Econom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en, Sophia, and Estelle Dauchy. 2018.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ourcing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IMF Working Paper 18/5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Grossman G., and E. Helpman. 1991. *Innov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Peri, G. 2005. "Determinants of Knowledge Flows and Their Effect on Innova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7 (2): 308–22.

悼念胡琪昂

在本期《金融与发展》准备出版之际，胡琪昂女士意外去世。胡女士是一位越南公民，于2011年加入IMF。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具有敏锐的分析思维，这与她的实用主义和自律性相匹配。她的才智和微笑将被深深怀念。《金融与发展》团队向她的家人和朋友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政府补贴：喜忧参半

一些政府补贴是合理的，但往往也存在缺陷

本尼迪克特·克莱门茨、伊恩·派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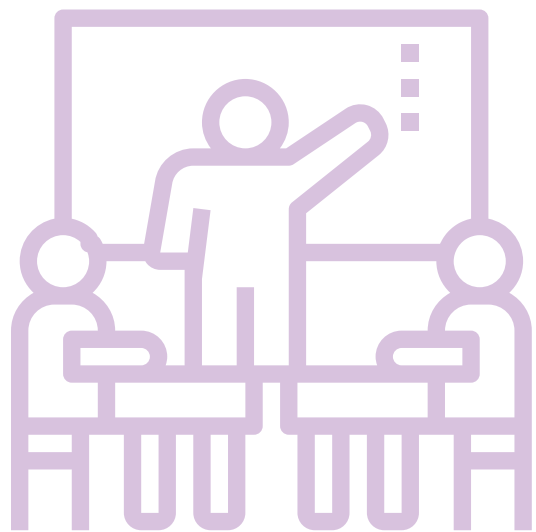
在挪威，电动汽车车主可以免付高速公路过路费。在澳大利亚，对于雇用青年、原住民或年长人士的企业，政府将承担部分工资。在新加坡，将全球或地区总部设在该国的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所有这些都是政府补贴的范例——补贴是政府的财政工具，以鼓励经济发展、帮助弱势群体或推进国家的其他目标的实现。

补贴的形式多种多样。政府有时会人为抬高物价，此举相当于为农民提供了补贴，以提高他们的收入。政府可能会提供服务，比如将高等教育的学费或地铁票的价格降低至成本以下。政府也会为修路或建造电厂的贷款支付部分利息。或者，政府会为某些产品或技术提供税收减免。

何时提供政府补贴是合理的呢？在纠正所谓的市场缺陷时，补贴可以是一项好的政策；换言之，在面对激烈的竞争，私人市场无法带来令社会满意的结果时，补贴是合理的。比如，政府补贴可以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这不仅会让企业受益，还会惠及整个行业或社会。政府补贴可以帮助初创企业度过最初的亏损阶段，直至它们做大做强，能够营利为止（尽管政府需要充分的信息来确定这些企业做大时能否获得成功）。

对不平等的影响

但是，提供补贴也有缺陷。能源补贴就是一个例子，能源补贴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低收入家庭。如果人人都能获得补贴，比如相对富裕的人士，那么就会造成政府资源的浪费。面向贫困家庭的定向现金转移支付的成本则低得多。如果政府补贴不能合理地让产量最多者或消耗最多者受



益，也会加剧不平等现象。比如，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前 20% 的家庭从能源补贴中获得的益处平均是后 20% 的家庭的 7 倍 (Coady, Flamini, and Sears, 2015)。

另一大缺陷是：无法解决市场缺陷的补贴可能会导致价格扭曲，造成稀缺劳动力和资本的错误配置，从而破坏增长。比如，推高石油价格或人为地帮助能源密集型行业的企业保持稳定发展，并抑制对替代能源的投资。对农业种植者提供补贴，使农民获得的价格高于进口食品的价格，也会抑制提高效率的动力。经合组织 2017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欧盟，这些补贴平均占 2014 年至 2016 年农业总收入的 20%。

有些补贴是不利的，比如针对矿物燃料的补贴。这些补贴不仅昂贵，而且有悖于环保目标，比如降低因大气污染造成的死亡率，或完成在 2015 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所承诺的减少二

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从广义上来讲，当能源价格无法全面反映生产成本，也不能全面反映我们所要付出的环境代价时，就可以认为是政府提供了能源补贴。以这个范围更广的标准来衡量，2015年全球的政府补贴估计高达5.3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6.5% (Coady and others, 2017) ——高于各国政府的医疗支出。这些补贴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很普遍。中国的补贴最高，达到2.3万亿美元，其次是美国（7000亿美元），接着是俄罗斯和印度，分别为约3000亿美元。

改革战略

补贴改革并不轻松，因为这往往会带来物价的上涨，比如汽油或食品价格上涨，从而会对消费者的钱袋子产生即刻影响。迫于利益集团和公众的压力，许多减少不利补贴的尝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无法解决市场缺陷的补贴可能会导致价格扭曲。

因此，政府需要制定全面而详细的改革战略，明确未来物价走势和收入用途的长期目标 (Clements and others, 2013)。同时，还需要具有深远影响的沟通战略，以显示补贴如何替代更为高效、更为平等的公共支出。循序渐进的方法或许会有帮助，因为它让消费者和企业有时间适应变化。旨在保护弱势家庭的现金转移，以及下岗工人再培训等措施对平息反对意见往往至关重要。

尽管补贴改革并非易事，但许多国家（多为能源生产国）在近年来都先后提高了国内物价，这些国家包括安哥拉、埃及、印度、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但是，仍需大力推进改革，尤其是要

在燃料价格中反映环境代价，这应该成为各国战略的一大主要内容，以实现2015年他们在《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做出的减少碳排放的承诺。FD

本尼迪克特·克莱门茨 (Benedict Clements) 是IMF非洲部的处长，伊恩·派瑞 (Ian Parry) 是IMF财政事务部的首席环境财政政策专家。

参考文献：

Clements, Benedict J., David Coady, Stefania Fabrizio, Sanjeev Gupta, Trevor Alleyne, and Carlo A. Sdravovich. 2013. *Energy Subsidy Reform: Lessons and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oady, David, Valentina Flamini, and Louis Sears. 2015. "The Unequal Benefits of Fuel Subsidies Revisited: Evide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Inequality and Fiscal Policy*, edited by Benedict Clements, Ruud de Mooij, Sanjeev Gupta, and Michael Keen.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保持 资讯畅通

随时随地阅读
《金融与发展》杂志

Imf.org/fandd

有阿拉伯文版、中文版、英文版、
西班牙文版、法文版、日文版和俄文版



从维也纳 到世界贸易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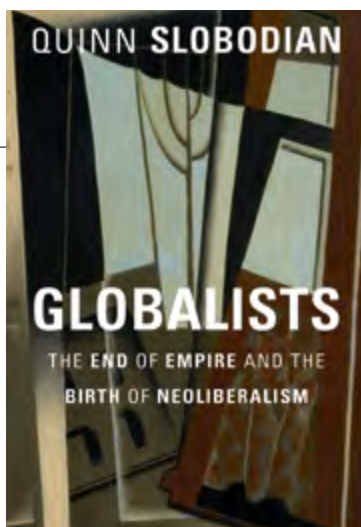
新自由主义目前已成为 20 世纪末和新千年时期所有错误的罪魁祸首。从这个一直被滥用的词中可以看出，有人认为市场生来就具有优越性，然而这个认识既物质又粗浅。尊崇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

到目前为止，许多重要人物，比如查尔斯·莫尔（撒切尔的官方传记作者）、奥利弗·莱顿（英国保守派学者）和作家戴维·弗鲁姆都认为这是人类自身造成的结果。他们抱怨称，一个人拥有的房产越多，所欠的债务就会越多，而非安全性越高，而且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威胁，而不是机会。

斯洛博迪安 (Quinn Slobodian) 的这本新作就是一部从哈布斯堡帝国和维也纳灿烂的士人文化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思想史。他认为，世人最终构建起来的、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秩序关心的不是自由和自由放任主义及亚当·斯密的思想观点，而是如何保护财产，使其免受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进的政治需求影响。

本书无意描述全球化的金融基础设施，而是将更多的笔墨花在如何构建当今的贸易机制之上。书中不乏一些令人惊喜的洞察，这些洞察显示了有多少关于全球化的现代观点——受关税壁垒威胁，无法承受螺旋式下降的贸易——是源于维也纳的。来自维也纳工商业协会的克莱夫·莫里森-贝尔 (Clive Morrison-Bell) 构建了一个关于欧洲呆板的关税壁垒的实物模型；来自维也纳商业周期研究所的奥斯卡·莫根施特恩 (Oskar Morgenstern) 用图片描述了大萧条期间不断萎缩的全球贸易。

斯洛博迪安将他的研究建立在弗吉尼亚（大众选择）和芝加哥（支持货币主义和放松管制）学派的基础之上。新书中的两位关键学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威尔海姆·罗佩科斯——对



奎因·斯洛博迪安

《全球主义者：帝国的终结
和新自由主义的诞生》

哈佛大学出版社，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2018年，381页，35美元

人类历史上的三大事件做出反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非殖民化。为此，这些思想先驱们纷纷转向国际机构，以期在稳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保证财产权和国际分工的机制。在能保证超越国家且没有地域差别的潜在机构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国际商会，其次是国际联盟。

在斯洛博迪安的新书中，推崇新自由主义的主人公们将该秩序视为平衡政治事务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约束，民主主义可能会做出过多（无法实现的）承诺。国内的宪法秩序可能是一大制约，但是如果将秩序置于国际法律框架之中，那么这种秩序就会比较安全。

总而言之，斯洛博迪安为我们奉上了一部较为深入且饶有趣味的作品，尽管他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深入。他说，书中的主人公维护财产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现状。但是，这个解释并不具有说服力：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支持现代新自由主义的父辈们面对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那个财产可以被任意没收的时代——往往基于国家、种族或宗教的身份——这是边缘化、去人性化和最终造成破坏的本质内容。他们的分析不能用以反对征税，甚至是高额的累进税制，前提是税收必须公平公正的。对财产的维护反映了，同时也源自于对人类尊严的更深层次的担忧。FD

哈罗德·詹姆斯 (HAROLD JAMES) 是普林斯顿大学和IMF的历史学家。

纪念币

展示年度全球盛会的纪念币

萨沙·尤梅纳

纪念币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用以纪念特殊的场合或事件。在古罗马，人们铸造纪念币来庆祝战争的胜利。如今，纪念币则是用于庆祝国际合作和文化多样性。

自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成立以来，两个机构的领导层和成员国都会在秋季会面，共同商讨解决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重要议题。1946年3月，理事会的成立大会在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城举行。当时设计了一枚铜制纪念币，

一面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肖像，另一面是佐治亚州的轮廓图。这枚纪念币出现在每个代表的晚宴餐盘中。

年会通常都是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但每三年领导人会在这两个机构中的189个成员国中的一个相聚。为了纪念

和促进这一全球性的聚会，东道国通过发行硬币、邮票、纸币、特别纪念章以及其他纪念品来博取关注，通常这些纪念品都反映了当地文化、经济进步和科技创新。

每套纪念币都代表了东道国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鉴于召集会议的机构的重点包括维护全球金融体系，因此硬币和纸币尤其适合。在多数情况下，纪念币并不能用于购物，但是却有着特殊的价值，受到收藏家的追捧。例如，菲律宾在举办1976年年会时曾发行了一枚面值1500比索的金币，这是首次以金币的形式出现的纪念币。这枚金币的拍卖价超过了1500美元。如今，这枚金币的面值约合28美元。泰国、西班牙、捷克、阿联酋、新加坡、土耳其和日本也都效仿此举，发行了自己独特的硬币。

泰国又向前进了一步，在1991年发行了一个特别纪念夹，里面包含有面值10泰铢、20泰铢、50泰铢、100泰铢和500泰铢的纸币。在这些纸币的下方印着用泰文和英文书写的“1991年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字样，并且在其对角线上印有“样品”的字样。

每套纪念币都代表了东道国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并使用了最新的铸造技术。2003年在迪拜举行的年会上，阿联酋首次采用彩色设计年会纪念币。2006年，在东道国新加坡发行的硬币上描绘了熙熙攘攘的天际线以及世界地图，传达出该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2012年，





日本采用特殊的彩虹色技术和精密微加工技术，在纪念币上描绘了一幅拥有彩虹般光泽的富士山图景。

2015年，秘鲁设计了一枚漂亮的银币，而不是硬币，因为该国的法律规定所有硬币（包括纪念币）的一面必须是国徽，因此仅剩一面可以进行其他设计。选择金属纪念币这一形式能够展示更多，其一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利马大教堂，另一面是年会新的圆环形 logo 旗帜。

今年的年会将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行，届时东道国将发行纪念邮票。如果你参加这次的年会，那么你一定想多要几张邮票：说不定哪天这些邮票会变得非常值钱。FD

萨沙·尤梅纳（SASCHA DJUMENA）是世界银行的中亚项目协调人，收集邮票和硬币已超过40年。本文所示的硬币和纪念章均来自作者的私人收藏。





2018 | 印度尼西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集团
年会

研讨会



2018年10月8日—14日

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 努沙杜瓦



关注我们

#IMFMeetings

#WBGMeetings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期间，将在世界级的研讨会上讨论影响全球经济和发展的关键议题。

加入我们的讨论吧！

更多信息和注册详情，请浏览
www.imf.org/fallseminars2018

Finance & Development, September 2018



MFICA2018003